

漂泊者的中國風景：臺人音樂家柯政和 戰前 (1922-1945) 在北京的社會觀察與書寫*

羅詩雲**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摘 要

柯政和 (1889-1979) 為臺籍音樂教育家，一生流離於臺灣、日本、北京，對中國近代音樂教育貢獻良多，尤其活躍於一九二〇年代以降至終戰的北京文化界。作為近代音樂教育開創者的柯政和，卻鮮於臺灣文史研究中受到討論，此緣於資料相對偏少外，其活動空間主要在中國且戰後未曾返臺，以及任教於日本勢力下戰時北京校院等因素使然；然而，就戰前臺人東亞移動、戰爭期北京文化網絡，以及臺人海外社群研究而言，柯政和皆屬重要。基此，本文以柯政和戰前文化活動為考察，探究其於臺灣、中國不同歷史階段的形象建構與人際往來，以及著作《中國人的生活風景》、《中國的社會風景》之中國敘事。藉此呈現戰前島外離散臺人的形象演繹與文化視域，掌握旅居北京臺人漂泊主體的精神樣貌。

關鍵詞：柯政和，戰時北京，漂泊，風景

* 本文為 110 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閩境之地（二）：終戰前後旅京臺灣知識分子的離散經驗與社群敘事 (1937-1949)」(MOST 110-2410-H-263-007-) 之部分研究成果。同時，感謝本文兩位審查人與編委會悉心指正，謹此致謝。

** 作者電子郵件信箱：sylo@nccu.edu.tw

一、前言：東亞離散的臺人個案

柯政和 (1889-1979)，原名柯丁丑，字安吉（安士），臺南鹽水人。1911 年畢業於臺北總督府國語學校，1915 年東京音樂學校師範科（今東京藝術大學）畢業後，同年返臺於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擔任囑託，¹ 1916 年升任助教授。1919 年再度赴日，就讀東京上智大學文學科，後進入東京音樂學校研究科學習，1922 年轉赴北京教授鋼琴、小提琴和曼陀林，兼具中西音樂素養，學習國語，改名柯政和。1923 年 10 月受聘為北京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音樂組講師，居於東城大阮府胡同。旅京期間，1926 至 1929 年參與西樂社、愛美樂社等音樂社團，並主編《新樂潮》雜誌，1928 年創立音樂出版社中華樂社。其出版譯述音樂相關著作百餘種，包括 1930 年出版的《音樂通論》，表現建設中國音樂的熱忱。1937 年後日本進佔北京，柯氏任北京師範學院音樂科主任兼訓導長、東亞文化協議會支那側委員、北京新民學院教授，兼任新民會中央指導部委員，又任新民會北京特別市總會事務局次長，協力民眾教化的宣輔工作，1941 年撰寫〈保衛東亞之歌〉等時局歌曲。終戰後因新民會職位的經歷，遭國民政府關押南京，1949 年獲釋。1952 年為北京人藝樂器工廠編譯音樂教材，1957 至 1963 年任職輕工業部科學研究院樂器研究所、北京樂器總廠。1966 年被打入牛棚，下放寧夏回族自治區，爾後病逝。柯政和畢生投入現代音樂教育，包括教材編纂建設、支持並舉辦學校社團活動與音樂會，創設中國第一批新型音樂社團，提出以音樂促進精神文明的美育思想。²

關於柯政和的前行研究不多，主要聚焦北京近代音樂文化的相關著述，或見於臺灣歷史人物的史料考掘、研究文獻。賀逸文〈師大十二年音樂教授柯政和〉為貼近人物的訪談實錄，內容肯定其音樂貢獻：「柯政和於最近幾年內，在沈寂的故都

¹ 「囑託」即教育約聘人員，工作內容是輔助該校正式教師教諭及訓導的教學。

² 柯政和生平，參見薛宗明，《臺灣音樂辭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3），「柯政和」，頁 193-194；許雪姬，〈1937 年至 1945 年在北京的台灣人〉，《長庚人文社會學報》，1.1（桃園：2008），頁 57；梁茂春，《音樂史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普及音樂教育家——柯政和〉，頁 51-53；中西利八編纂，《中國紳士錄 民國三十一年版》（東京：滿蒙資料協會，1942），頁 142；問楚寒，《〈新樂潮〉之“新”——20 世紀 20 年代柯政和辦刊思想研究》（北京：中國藝術研究院碩士論文，2017），頁 8；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https://who.ith.sinica.edu.tw/>，2023 年 7 月 10 日檢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數位資料庫」（<https://mhdb.mh.sinica.edu.tw/>，2023 年 7 月 10 日檢索）。

音樂界，做了許多的工作，擊破了這些沈寂。」³ 此文為 1935 年《世界日報》「學人訪問記」專欄文章，先由個人家庭生活、學習經歷敘述，再介紹音樂教育、教科書出版成就，建構了音樂家之外的人物形象。整體而言，柯政和的生平經歷和音樂教育活動討論，尤其著重一九二〇至四〇年代於北京文化界的活躍。⁴ 許雪姬〈1937 年至 1945 年在北京的台灣人〉盤點了戰時旅居北京的臺灣人，柯政和作為教育界臺人代表，連結了日治時期臺人至北京發展的人際網絡。許雪姬此文續述柯政和於戰後反右運動與文革的不幸遭遇，亦省思江文也、張秋海、柯政和等戰後滯留中國的臺人藝術家境遇；秦賢次〈五四時期臺灣學生負笈行——柯政和、宋斐如、王慶勳、洪炎秋〉聚焦五四時期臺人留學生，以「音樂教科書之王」定位柯政和，除了音樂教學，更成立音樂出版與樂器銷售的中華樂社和以普及音樂為宗旨的北京愛美樂社。秦賢次此文提供一九二〇至三〇年代柯政和音樂教育活動的概況，且將日治時期前往中國就業的臺灣人分為前、中、後期，前期包括王悅之、張秋海、范本梁、謝文達以及柯政和。⁵

離散 (diaspora) 的傳統定義並不能概括討論戰前旅京臺人的狀況，日治時期臺人前往中國不全然緣於外力造成的被迫遷徙，而存在如柯政和般主動漂泊之例。黃英哲基於臺人兩岸離散經驗具有主動越境的意涵，提出以「漂泊」(drifting) 取代「離散」的用語，一則標誌臺人跨境能力的社會資本與主觀意願的文化資本，二則強調臺人離散經驗具有打破地域劃分並重組文化生產的能動性。⁶ 承此，若由戰前臺人東亞移動狀況來論，柯政和作為引介郭柏川、江文也、林朝權等臺人至日本佔領下北京高教院校任教的關鍵人物，正彰顯他對當時北京文化界的影響力與文化資本；日治時期行旅中國的臺灣人亦多提及柯政和其人其事，如三訪中國的陳逢源，

³ 賀逸文等撰，張雷編，《北平學人訪問記（上）》（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頁 64。

⁴ 韓國鑽，《韓國鑽音樂文集（一）》（臺北：樂韻出版社，1990），〈柯政和資料初探〉，頁 183-192；胡旖旎，〈對《標準樂理教科書》的介紹與評價〉，《中國音樂教育》，10（北京：2016），頁 27-31；彭芳，〈柯政和對我國音樂事業的貢獻〉，《當代音樂》，34（長春：2015），頁 124-125；李岩，〈朔風起時弄樂潮——20 世紀 20 年代的西樂社、愛美樂社及柯政和〉，《音樂研究》，3（北京：2003），頁 34-43；郭豔波，〈對北京愛美樂社——音樂雜誌《新樂潮》的研究〉，《北方音樂》，7（哈爾濱：2010），頁 31；問楚寒，《《新樂潮》之“新”》，頁 5-58；賀逸文等，《北平學人訪問記（上）》，〈師大十二年音樂教授柯政和〉，頁 63-71。

⁵ 許雪姬，〈1937 年至 1945 年在北京的台灣人〉，頁 33-84；秦賢次，〈五四時期臺灣學生負笈行——柯政和、宋斐如、王慶勳、洪炎秋〉，《文訊》，283（臺北：2009），頁 75-84。

⁶ 黃英哲，〈漂泊〉，收入史書美、梅家玲、廖朝陽、陳東升編，《台灣理論關鍵詞》（新北：聯經出版，2019），頁 295-305。

其記述 1934 至 1938 年中國行旅經驗的《新支那素描》(1939)，盡述北京的名勝時局，並專節描寫周作人、柯政和、張我軍、李振南、村上知行等北京人物。張玉書、黃旺成、楊水心的中國行旅著述亦出現柯政和身影，顯見他對當時臺人跨境聯繫網絡與文化的影響，更揭示旅居北京多年的柯政和之重層面貌。然考量離散概念具有人跨越地理、語言、文化與國界的流動，生活領域打破固有地區社會界限的多地聯繫意涵，故本文行文上若指涉越境情境仍使用「離散」一詞，論述柯政和主體面貌與文化活動則使用「漂泊」，視柯氏為東亞離散情境下積極的文化生產者，參與知識的重組與傳承。⁷

自一九一〇年代中葉以降乃至中日戰爭時期，臺灣、中國兩地報刊皆可見柯政和的身影，尤其戰時北京的文化動態。作為近代音樂教育開創者的柯政和，卻鮮少於臺灣文史研究中獲得討論，箇中原因除資料偏少外，另有其活動空間主要是在中國，且戰後未曾返臺，以及戰時任教於日本勢力下北京校院的敏感身分；然而，就戰前臺人東亞離散狀況研究，或是旅居北京臺人社群網絡之角度，柯政和都是不可忽視的存在，更是串連旅京臺人社群紐帶的重要線索。因此，本文將由柯政和一九一〇年代至四〇年代的文化活動論起，由報刊報導、人物訪談與論著，建構其生平事蹟以及個人形象，並梳理旅京臺人社群網絡；次者，析論柯政和《中國人の生活風景》(1941) 與《中國の社會風景》(1943) 二作，呈現臺人戰時的中國視域與文化觀察。本文欲藉柯政和個案，呈現戰前旅居島外臺人的形象演繹與文化視域，以掌握戰前臺人漂泊主體的精神樣貌。

⁷ 離散的傳統模式關係到受迫性遷移，通常聯想至失落、放逐或某種受苦狀態。英國社會學家魯賓·柯恩 (Robin Cohen) 將離散社群形式分為五類：受害者、勞動力、貿易買賣、帝國、文化等，此分類有時疊合或者改變，且未受限於特定的歷史時期。離散可謂指涉一跨國的形式、形構與過程，同時鬆動了文化與知識結構的疆界，而可廣義應用於日治時期臺人東亞越境移動的討論。戰前柯政和的東亞離散情境可視為「現代性殖民離散」階段的延伸。離散的傳統模式與社群形式，參見卡爾拉 (Virinder S. Kalra)、柯爾 (Raminder Kaur)、哈特尼克 (John Hutnyk) 等著，陳以新譯，《離散與混雜》(臺北：國立編譯館、韋伯文化國際出版，2008)，頁 15-21；離散論述的階段演變，參見賴俊雄，〈當代離散：差異政治與共群倫理〉，《中外文學》，43.2 (臺北：2014)，頁 13。

二、柯政和形象的報刊建構及其旅京網絡

本節由一九一〇年代至四〇年代中國、臺灣報刊篇章、時人記述與柯政和撰述，考掘柯政和的文化活動與形象建構。以刊登篇幅較多的《臺灣日日新報》與《大公報》、《申報》為主要場域，旁論臺人中國行旅敘事的柯政和印象，所述網絡人物主要以文獻可見實質交往紀錄者或柯氏記述者為先，以拼湊其行跡，助於掌握柯氏資料與活動。⁸

(一) 柯政和的形象跳躍：以《臺灣日日新報》、《大公報》、《申報》為主要場域

1945 年戰前《臺灣日日新報》與《大公報》、《申報》刊登多篇關於柯政和的報導，前者時間集中於 1915 至 1919 年，以柯政和臺灣、日本活動為敘述內容，後兩者相對集中於 1934 至 1938 年間，聚焦北京時期的活動；同時期報刊如《詩報》、《世界日報》、《風月畫報》、《圖書展望》、《音樂教育》、《華文大阪每日》、《立言畫刊》等亦見單篇文章或照片。整體而言，柯政和呈現的形象截然劃分為兩階段：前期為一九一〇年代以來的留日臺人學生代表與音樂家，後期為一九三〇年代中葉後日本政權的文化附庸者樣貌。

由柯政和活躍的一九一〇年代中葉至 1945 年期間，早期報刊消息多為《臺灣日日新報》報導。然最早一篇為 1913 年時為東京音樂學校學生的柯政和所撰述的〈臺灣の劇に就いて〉（關於臺灣的戲劇），基於新知識系統審視臺灣戲曲傳統，文中追溯臺灣戲曲源頭為中國，述及中國來臺的京戲班對臺灣的影響，並批評臺灣戲曲落伍，演員缺乏創新能力；⁹ 相關報導則以 1915 年 4 月 20 日〈高砂寮の近況〉為早期訊息，同月 22 日另刊有同篇內容之漢文報導，提及國語學校出身的柯

⁸ 相關篇章資料查詢：中國教育圖書進出口有限公司、得泓資訊有限公司，「中國近代報刊資料庫：《大公報 1902-1949》」（<http://tk.dhcd.com.tw/tknewsc/tknewskm>，2022 年 6 月 29 日檢索）；上海圖書館，「中文期刊全文數據庫 (1911-1949)」（<https://www.cnksy.com/search/advance?pid=12&isProduct=false>，2021 年 1 月 9 日檢索）。

⁹ 柯政和是以日本殖民者文明開化視角審視臺灣戲曲發展，傳遞被殖民「他者」文化的刻板印象，不過對傀儡戲、皮影戲、布袋戲之三類偶戲具完整敘述。參照康尹貞，〈日治時期臺灣戲曲之研究 (1895-1937)〉，《戲劇學刊》，21（臺北：2015），頁 62-63、68-69；柯丁丑，〈臺灣の劇に就いて〉，《臺灣教育會雜誌》，133（臺北：1913），頁 57-62。

政和留日歸臺的消息。概覽《臺灣日日新報》的柯政和身影，多關於音樂會活動、組織與音樂教育性質消息，被描述為臺灣音樂界名手、具音樂天賦且富前途的音樂家、負盛名的本島音樂家等。¹⁰ 尤其提及他接受東洋協會臺灣支部補助，留學東京音樂學校的經歷。東洋協會的前身為 1898 年成立的文化團體「臺灣協會」，由臺灣總督府首任民政長官水野遵離職後所組織，目的為強化日臺交流。同年 12 月在臺設置支部，以闡揚臺灣社會實態為要務，工作之一即培育殖民地經營人才。1907 年因應日本殖民地經營擴展至東亞其他區域，改組為「東洋協會」，故此組織性質實為協助日本殖民地擴張政策的政府外圍團體。¹¹ 柯政和的培育事蹟一則顯現日本當局對臺灣資源的重視，二則表現殖民地經營的臺日扶攜，故殖民地臺灣媒體順勢構築柯氏留日的音樂家形象，予以宣傳。

一九二〇年代後的臺灣報刊未見柯政和的訊息，至三〇年代中葉方於中國報刊見到密集報導，此可推想與柯政和 1922 年即赴中發展有關。1930 年 7 月 8 日《申報》〈平大教授團赴日視察〉記述北京教授團柯政和一行人視察朝日新聞社、都島工業學校等文化教育機構，成員皆有留日經驗，囊括體育、中文、物理、哲學領域，屬中日交流訊息；¹² 另需留意的是，賀逸文（茜蘋）發表於 1935 年《世界日報》〈師大十二年音樂教授柯政和〉，此文特殊處是撰文者親訪柯政和後實錄，性質偏於口述小傳。其角度先由個人家庭生活、學習經歷敘述，再介紹音樂教育主張、教科書出版活動。內容記錄許多關於柯政和行事風格與處事態度的獨特感受，特別是日本文化對其人其行的內外薰陶：

他的夫人是日本籍，所以家庭充滿了日本的風味。在我們談話的時候，他夫人很客氣地招待。同時柯氏自己，也許是在日本居住年久的關係，對人總有些和藹的態度。……人究竟是富於感情的，無論是對於人或是

¹⁰ 相關報導參見：〈臺灣音樂會組織〉，《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16 年 2 月 14 日，第 5 版；〈組織臺灣音樂會〉，《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16 年 2 月 15 日，第 6 版；〈東洋協會と教育 音樂學校修業の本島生〉，《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19 年 5 月 17 日，第 1 版；〈臺中大音樂 東京專門家招聘〉，《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19 年 8 月 7 日，第 7 版。漢珍數位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漢珍知識網：報紙篇《臺灣日日新報》」（https://elib.infolinker.com.tw/login_rrxin.htm，2021 年 1 月 8 日檢索）。

¹¹ 林呈蓉、荒木一視，〈臺灣之於「東洋協會」的歷史意義〉，《Journal of East Asian Identities》，1（山口：2016），頁 54-60、72-73。日治時期臺灣留日學生住宿之「高砂寮」，即由臺灣總督府民政局出資 1912 年建於東洋協會專門學校內，1927 年以前由東洋協會管理。

¹² 〈平大教授團赴日視察〉，《申報》（上海），1930 年 7 月 8 日，第 5 版。

地方，相處日久，總有些特別的好感。柯氏在日本居住有十年以上，所以提起日本的時候，好像特別興奮似的：「日本音樂界的路徑很對，所以特別發達，我國固然有很好的音樂史，但是近代的路線不對，弄得亂七八糟……。」¹³

賀逸文由柯政和的日常行事與日籍夫人等介紹，描繪了其日式作風與文化思想，建構了音樂家之外的人物形象；其中特殊之處，為柯政和在訪問過程中掩飾來自臺灣的身分背景，表示自己生於福建安溪縣。此印證日治時期旅居中國的臺人選擇冒籍以迴避中日國族矛盾的普遍作法，對於中國社會而言，臺灣人的日本籍民身分意味著日本的次帝國主義者，於某種優越地位之外所承擔的身分包袱。

一九三〇年代後以《大公報》、《申報》刊載柯政和消息較多，其他報刊《風月畫報》、《圖書展望》、《音樂教育》、《華文大阪每日》、《立言畫刊》亦有單篇介紹或照片，依據發行單位或區域而有相異評價。如日方發行之《華文大阪每日》所刊〈保衛東亞與保衛東亞之歌 譜成旋律的兩位作曲家〉稱柯政和為中國一流作曲家，略歷介紹柯氏 1939 年任新民會中央指導部次長，現為新民會北京特別市總會事務局次長，其於北京地位不同一般；¹⁴ 若以 1937 年為界，《申報》、《大公報》評價則有前後的顯著變化，正面評價如〈樂壇消息〉稱柯政和為音樂教育名家；〈音樂家 柯政和著作風行各地〉讚譽柯政和「近二十年提倡音樂，不遺餘力」（見圖一），極為肯定其音樂教科書編纂之貢獻。¹⁵

至 1938 年後〈平津雜寫（六）文化與教育〉直斥接任北師大教職的柯政和無恥，用語激烈；〈一年來的漢奸活動 傀儡組織的內幕及其現狀〉更形容他是雙料亡國奴：「關於組織新民會事宜，最賣力的要算是宋介及柯政和兩人。柯政和即是柯丁丑，柯發為賣國行動，據說很受日本紅裙的感化。但因柯是台灣人，一個雙料亡國奴緣故，所以新民會成立之後，柯僅任所謂中央指導委員而已。」¹⁶ 此間報

¹³ 賀逸文等，《北平學人訪問記（上）》，頁 64-68。

¹⁴ 高天棲，〈保衛東亞與保衛東亞之歌 譜成旋律的兩位作曲家〉，《華文大阪每日》，6.7（大阪：1941），頁 8。《華文大阪每日》是由日本大阪每日新聞社編輯、東京日日新聞社發行的綜合性中文雜誌，發行時間自 1938 年 11 月至 1945 年 5 月，銷售網遍及日本在華佔領區及殖民地臺灣，扮演文化思想戰線上的重大作用。施淑，〈大東亞文學共榮圈《華文大阪每日》與日本在華佔領區的文學統制〉，《新地文學》，1.1（臺北：2007），頁 41-42。

¹⁵ 〈樂壇消息〉，《大公報》（天津），1934 年 7 月 31 日，第 13 版；〈音樂家 柯政和著作風行各地〉，《申報》（上海），1936 年 3 月 10 日，第 13 版。

¹⁶ 〈平津雜寫（六）文化與教育〉，《申報》（漢口），1938 年 7 月 17 日，第 2 版；國軒，〈一年



圖一：〈音樂家 柯政和著作風行各地〉圖文

刊顯示日本對北京高等學府的奴性統治與文化政策，批判柯政和接任北師大教授、北京師範學院總務長、東亞文化協議會文學部代表、新民會幹部、新民學院教授等職，助長日本對中國的文化侵略。呈現柯政和形象已由傑出的北京音樂教育家，劇變為日本華北傀儡政權的文化附庸者與叛國者，形成鮮明對立。

若要完整考察柯政和形象，以及瞭解 1937 年事變後留滯北京的選擇，則需追溯他赴北京發展以來的文化論說與活動。柯政和〈民國十六年的我國音樂界〉提出音樂教育的發展應以社會調查為基礎，但中國戰事頻仍、交通不興阻礙素材採集與統計，故感嘆音樂理論、組織與教科書的缺乏。¹⁷ 1937 年之前的音樂思想從其創辦之社團、刊物路線研判，可知具有強烈的現代意識，扣合中國樂壇現狀而注重實務與民眾教育；¹⁸ 中日戰爭後，柯政和仍於北京教育界矢志推動音樂教育，〈中國音樂的復興〉具體提出音樂教育的實踐方針：

復興中國音樂一事，在事變前，政府方面也曾有人提倡，然而結果並未見到若何成效。因為以前對於提倡音樂，其目標與方法非從根本作起，而一切音樂教育方針，朝令夕改，漫然設立音樂教育機關，……復興中

來的漢奸活動 傀儡組織的內幕及其現狀》，《大公報》（香港），1939 年 1 月 23 日，第 8 版。

¹⁷ 柯政和，〈民國十六年的我國音樂界〉，《新樂潮》，1.5（北京：1927），頁 1。《新樂潮》為柯政和創辦的愛美樂社社刊，北京重要的音樂刊物，具有時效性與西樂知識普及之影響，推崇二十世紀現代文化的意念，發行自 1927 年至 1929 年，共 10 期。郭豔波，〈對北京愛美樂社——音樂雜誌《新樂潮》的研究〉，頁 31。

¹⁸ 《新樂潮》具深切現代意識，關注音樂的新藝術、新技術、新現象等現代事物，從而表現柯政和開放、普及、實用等思想特性。問楚寒，〈《新樂潮》之“新”〉，頁 28-35。

國音樂之工作雖多，約而言之，最主要者可分四大部分：（一）整理固有的音樂；（二）改良固有的音樂；（三）吸收西洋音樂；（四）建設新的中國音樂。¹⁹

柯政和評價事變前中國音樂的教育政策朝令夕改，並無實績可觀。而推動音樂教育的關鍵，在於推動音樂成為國民生活的必需品方有真正價值，故〈音樂與文化〉論及北京崑曲、京劇、評戲與音樂的關係，柯政和就北京文化環境點明戲劇是音樂種類當中與文化關係最緊密者，能傳達思想教化社會。²⁰ 另〈教育音樂的目標〉直指音樂是精神最豐富的藝術，而於中國教育界忽略美育的情形下重申音樂教育的重要性：「我們要想求人格與人格的交通影響，就不能除掉藝術教育中的音樂。」²¹ 出身師範教育體系的柯政和主張音樂教育與人格養成、情意道德的相關性，提出完善的音樂教育是於吸收欣賞與唱歌、演奏發表之兩方面的調和，兼具理論與實務性。

柯政和秉持以實務結合民間生活推動音樂教育的理念，而北京的文化底蘊正具備推動中國音樂教育的發揮空間與資本。據時人回憶，具公費留日背景的柯政和對日本體制亦不排拒。²² 加之日本 1937 年佔領北京採取撫民政策的間接統治方式，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以新民會為民眾教化的前線團體，訴求中日文化的親近性與精神培育。²³ 是故，柯政和當時於中國音樂界的文化地位自然被日方看重，如 1941 年經過徵集評選的〈保衛東亞之歌〉作曲最終選定柯政和。戰前在北京耕耘音樂教育多年的柯政和，戰時選擇留在北京的原因應有對北洋政府音樂教育政策的不滿，以及日本接管北京後文化親善環境和個人經歷等；除了音樂教育，中日關係是柯政和戰時言論另一焦點，此源自戰爭環境的文化宣傳與新民會職務所使然，於華北教育家座談會提出語言溝通為中日文化交流基礎，樂見日語、華語課程於各級

¹⁹ 柯政和，〈中國音樂的復興〉，《華文大阪每日》，4.2（大阪：1940），頁 14。

²⁰ 柯政和，〈音樂與文化〉，《華文大阪每日》，6.9（大阪：1941），頁 2。

²¹ 柯政和，〈教育音樂的目標〉，《教育學報》，1（北京：1939），頁 28。

²² 莽克榮：「柯政和經常說日本的科學技術如何發達，國家管理的如何好……，對這些話，老志誠心存反感，有意與之疏遠。」可見柯政和的親日態度。莽克榮，《老志誠傳》（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4），頁 87。

²³ 北京成立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特徵之一，為任職者多有日本留學經驗。兼具民眾與行政組織性質的新民會則作為臨時政府的外圍團體，以民眾教化為核心工作，以青年為目標組織教育機關。安野一之，〈華北占領地域における文化工作の諸相〉，收入杉野要吉編，《交争する中国文学と日本文学：淪陥下北京 1937-45》（東京：三元社，2000），頁 323-326。

學校的設置；²⁴ 此外，一九四〇年代意圖重組區域秩序的日本大東亞共榮國策對地方民俗文化的宣導推動，連帶影響此際柯政和的中國敘事，甚而出版兩冊關於中國社會生活的文化專著，此部分待第三節討論。²⁵

(二) 旅京臺人的社群紐帶

柯政和為日治時期臺灣人前期即至北京發展的知識分子之一，更是引介郭柏川、江文也、林朝權等人至日本佔領下北京任教的關鍵人物，對於 1945 年以前臺人在北京的文化社群具有深切影響。²⁶ 就旅居北京的臺灣知識分子之人際網絡，除了一般所知的北京三劍客（張我軍、洪炎秋、張深切）或四劍客（張我軍、洪炎秋、蘇薌雨、連震東）之間的聯繫，柯政和更是考察戰前、戰時北京臺人社群網絡的一大線索，另形成任教北京各高等院校的臺人知識分子社群——「八仙」。²⁷ 由柯政和引介至北京任教且為八仙之一的林朝權，他自述：「我們自稱『北京八

²⁴ 編者，〈華北教育家座談會：十八、中日文化交流之首要辦法當在溝通語言先生對此有何高見賜教？〉，《國民雜誌》，2.7（北京：1942），頁 53；編者，〈華北教育家座談會：十八、中日文化交流之首要辦法當在溝通語言先生對此有何高見賜教？〉，《婦女雜誌》，3.7（北京：1942），頁 35。

²⁵ 「大東亞共榮圈」是昭和期日本挑戰歐美在亞洲殖民霸權的概念，並作為發展太平洋戰爭的思想根據，打破以中國為首的東亞秩序。隨一九四〇年代戰局擴大，日本在各殖民地逐漸建立與日本文化相關的地方論述，企圖以思想層次維繫東亞文化與民族統合的關係，將東亞文化建設推展至日滿支之外的地域；具體而言，如柳田國男所建立的日本民俗學與民族主義的關係密切，不僅遵循歐洲民俗調查與帝國主義的原則，更呈現其與國家主義間的共生關係。張文薰，〈帝國邊界的民俗書寫：戰爭期在台日人的主體性危機〉，《臺灣文學研究彙刊》，20（臺北：2017），頁 112-116；李文卿，《共榮的想像：帝國·殖民地與大東亞文學圈（1937-1945）》（新北：稻鄉出版社，2010），第 2 章，〈帝國想像與大東亞文藝運動〉，頁 21-113。

²⁶ 秦賢次，〈五四時期臺灣學生負笈行〉，頁 75-84；許雪姬，〈1937 年至 1945 年在北京的台灣人〉，頁 56-59。

²⁷ 「八仙」包含柯政和（1889-1979，北師大音樂系）、洪炎秋（1902-1980，北師大農學院）、張我軍（1902-1955，北師大文學院）、郭柏川（1901-1974，北平藝術專門學校美術系）、江文也（江文彬，1910-1983，北師大音樂系、北平藝術專門學校）、張秋海（1898-1988，北師大美術系）、張深切（1904-1965，北平藝術專門學校）、林朝權（1906-1990，北師大體育系）等。「八仙」稱號緣由，參見何標，《明月多應在故鄉》（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8），〈淪陷時期北京台灣文化人的主要心態〉，頁 135-136。八仙除了教育背景、赴京原因、活動場域、身分職業類似外，彼此間更有人際關係的連結。如張深切的啟蒙老師是洪炎秋之父洪棄生，洪炎秋透過同鄉張鍾鈴引介認識張我軍，張深切、洪炎秋、張我軍是北京活動時文學同伴，又一起加入旅平同鄉會；此外，柯政和與許地山亦有往來：「這部『留草』底刊行，承柯政和先生許多方面的幫助，應當在這裏道謝。」許地山，〈窺園先生詩傳〉，收入許南英著，《窺園留草》（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頁 247。（詩集原版於 1933 年 6 月刊於北京。）

仙』，每個禮拜都見面，到了日本投降後，大家都散了。」²⁸ 可見「八仙」稱號不單是後人所賦，成員亦以此自稱，戰前的社群活動和關係十分活絡緊密。而柯政和的臺人網絡尚包含同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者，如地學系林朝榮、教育倫理系洪耀勳二人，另有林煥文、林海音、陳天賜等人。²⁹ 事實上，前述賀逸文〈師大十二年音樂教授柯政和〉一文，出處原為 1935 年二至三月《世界日報》連載之「學人訪問記」專欄，柯政和的介紹實屬專欄第一階段發表的作品（1935 年 1 月 28 日至 1937 年 7 月 4 日）。柯政和得以躋身此間所錄之北京 56 位人文、科技、前清舉人、民國博士各領域學者人物的訪問之列，足顯他在北京文化界的重要性。³⁰

一九二〇年代以降行旅北京的臺灣知識分子更不乏對柯政和的描述與來往，如林獻堂夫人楊水心 (1882-1957) 和親眷 1934 年 9 月到北京遊覽，當月日記 13、20 日即記與柯政和的會面行事；³¹ 此外，以記者身分考察華北、華中的臺灣民眾黨幹部黃旺成 (1888-1978)，1930 年 5 月底的北京行與柯政和來往密切，黃旺成日記 1930 年 5 月 28、29、31 日皆見紀錄，兩人同樣畢業於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黃旺成稱柯政和為舊同窗。³² 黃旺成於《臺灣新民報》的連載遊記〈新中國一瞥的印象〉有四回提到柯政和，當中第 13、15 回亦引述柯氏所言的北京經驗：

柯君說，臺灣人到北平來的很少。自己住北平已經七八年，招待過親友連今夜才算第三回云。

不得不和這最易惹起人們感興的北平相離別了。據柯政和君說：無論日本、中國，欲尋一能夠愉快過日子的地方，實沒有比北平再好的。我們

²⁸ 葉芸芸，《餘生猶懷一寸心》（新北：INK 印刻出版，2006），〈歷史的播弄——訪林朝權〉，頁 260。

²⁹ 柯政和曾協助林海音父親林煥文的喪事，林海音丈夫夏承楹則曾向柯政和學習口琴，林、夏兩人婚禮亦以臺灣同鄉身分邀請柯政和。參見夏祖麗、應鳳凰、張至璋等，《蒼茫暮色裡的趕路人：何凡傳》（臺北：天下文化，2003），頁 61、67、96。陳天賜 (1898-1955)，臺中梧棲人，日本大學法律科畢業。1920 年赴中國，通過河北省考試委員會考試，取得任公安局長之資格。1931 年在北京創設志誠實業有限公司，經營和濟印刷局、立達書局。其事業體與柯政和 1935 年組織之實業公司有關，可推判兩人間存有聯繫。許雪姬，〈1937 年至 1945 年在北京的台灣人〉，頁 69。

³⁰ 賀逸文等，《北平學人訪問記（上）》，張雷〈序言〉，頁 ii-iv。

³¹ 楊水心著，許雪姬編註，《楊水心女士日記（三）一九三四年、一九四二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5），頁 354、358。

³² 黃旺成著，許雪姬編註，《黃旺成先生日記（17）一九三〇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7），頁 226-236。

雖然沒有這麼感想，但也得以想像北平之對於住慣的人們的魅力了。³³

1930 年左右臺灣人旅居北京的人數確實不多，和其他中國城市相比僅排第五位，除上海外，臺人多集中在華南沿海一帶。³⁴ 至於「住慣的人們」顯然指的是柯政和這類久居北京的人士，黃旺成雖能理解柯政和的想法，也體會北京旅行確存特殊興味，來自殖民地的他內心卻不覺得北京是愉快度日的處所。認知差異可推想乃緣於黃旺成時為民眾黨幹部的立場，且 1930 年以民報記者身分視察華中、華北，視野所見為北伐後表面統一、內裡分裂的過渡時期中國，無論地方秩序、建設、民權、國家主權皆待伸張確立，並非久居中國的柯政和所言為安穩所在。

臺灣櫟社詩人兼臺灣文社理事張玉書 (1876-1939) 1922 年遊歷中國，1931 至 1933 年於《詩報》發表多篇北京、上海、西湖遊歷詩作。³⁵ 1931 年底他發表了〈旅京柯政和樂師招飲〉：「藝精師曠滯燕京，傳得宮商負盛名。話舊有心期對酒，他鄉人重故鄉情。」³⁶ 張玉書描繪他於北京和柯政和暢談鄉情，將柯氏譽為春秋音樂家師曠，呈現他於北京音樂界頗負盛名的地位；1937、1940 年間的《灌園先生日記》亦見林獻堂旅居日本時期柯政和偕教育界人士的來訪、聚會紀錄，主要談論日華問題與教育問題，如 1937 年 12 月 7 日所記：「七時三連導柯政和來訪，柯以外尚有六名為北平教育界代表，來接協北華文化之建設，……聽柯氏之談日華關係及北京事情，使人生無限之感，十時方各歸去。」³⁷ 日記另顯露吳三連、顏水龍、劉明電與柯政和之往來或宴飲，展現臺人在日活動一隅；戰前三訪中

³³ 菊仙，〈新中國一瞥的印象（十三）〉，《臺灣新民報》（臺北），1930 年 9 月 27 日，第 7 版；菊仙，〈新中國一瞥的印象（十五）〉，《臺灣新民報》（臺北），1930 年 10 月 11 日，第 7 版。除了 1930 年黃氏中國行旅的往來，1916 年 7 月 19 日、1930 年 6 月 25 日、1933 年 12 月 20 日、1934 年 1 月 24 日之黃旺成日記亦見柯政和訊息，顯現兩人保持聯繫。

³⁴ 據日本外務省亞細亞局估計，中日戰爭前北京臺灣人人數不超過 60 人，至 1938 年 3 月局勢穩定後才逐漸增加。許雪姬，〈1937 年至 1945 年在北京的台灣人〉，頁 43-46。

³⁵ 張玉書，原名榮，號笏山，南投草屯人。臺灣作家張深切的養父，經商以樟腦事業致富，詩文、書法造詣均佳。1920 年加入霧峰櫟社，1922 年秋遊歷中國，賦詩多首。林文龍，《南投縣志卷七：人物志》（南投：南投縣文化局，2010），頁 62。

³⁶ 張玉書，〈旅京柯政和樂師招飲〉，《詩報》，25（桃園：1931），頁 1；後收入龍文出版社編輯部編，《詩報——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學大成（1930-1944）》第 2 冊（臺北：龍文出版社，2007），無頁碼。

³⁷ 林獻堂著，許雪姬編，《灌園先生日記（九）一九三七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04），頁 401。1937 年 12 月 12、15 日、1940 年 5 月 20 日、10 月 25、27 日之林氏日記亦見柯政和與其他臺人訊息。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E9%A6%96%E9%A0%81>，2023 年 7 月 11 日檢索）。

國的陳逢源，匯聚 1934 至 1938 年中國行旅經驗的《新支那素描》除描寫北京的名勝時局，更專節介紹周作人、柯政和、張我軍、李振南、村上知行等北京聞人，與訪京期間受柯氏宴請、嚮導之接待記事。《新支那素描》關於柯政和的具體評價，指出他是新中國建設上直接提攜中日關係而活躍於北京教育界的首要人物。戰時他於北京貢獻中國文化發展，與日本音樂界、官方皆保持良好關係，多方引介臺灣人進入在地教育界服務，串連北京的臺人社群。³⁸

至於柯政和一九二〇年代赴北京以來的中國人、日本人之人際網絡，此部分由柯氏主編刊物《新樂潮》、音樂社團愛美樂社、中國教育音樂促進會，以及一九三〇年代音樂出版事業、戰時北京文化組織（東亞文化協議會、新民學院、新民會）加以考察，可知他與音樂界、教育界、翻譯界、實業界人物皆有來往。名單包括劉天華（北京大學教員、北京女子文理學院音樂系教授、國樂改進社和愛美樂社發起人之一）、汪德昭（物理學家、北京師範大學物理系助教、西樂社發起人之一，後留學比利時、法國）、楊仲子（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音樂科教授、教育部音樂教育委員會編訂組主任）、李樹化（音樂教育家、《新樂潮》撰稿人）、程朱溪（《新樂潮》撰稿人、《音樂雜誌》編輯者）、繆天瑞（音樂教育家、《新樂潮》撰稿人，歷任上海新陸師範、上海同濟大學附中、中華藝術大學、武昌藝術專校音樂教員）、張秀山（北平師範大學音樂科講師、北平美術學院音樂系主任，曾與柯政和合編教材）、老志誠（鋼琴演奏家、作曲家、京華美術學院音樂系主任、北京師範大學教授、《藝術與生活》雜誌社音樂編輯）、初大告（翻譯家和語音學家、《新樂潮》撰稿人，歷任河南大學、重慶復旦大學、中央大學英文教授）等人；至於日人人脈同緣於音樂文化事業，例如與山葉大連洋行總經理山葉龜五郎的往來，以及共同組織愛美樂社的口琴家井奧敬一。³⁹ 1935 年柯氏更聯合中華樂社、立達書店、和濟印刷局、鋼琴廠組成志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打造音樂書譜印

³⁸ 陳逢源，《新支那素描》（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9），〈柯政和和其他〉，頁 98-99。

³⁹ 山葉龜五郎 (1879-?)，和歌山縣人，任職於伯父山葉寅楠的日本樂器製造株式會社，1921 年以東京音樂學校樂器部囑託身分視察歐美，1925 年 5 月於中國各地視察旅行，同年 6 月赴任山葉洋行常務董事、大連支店長。此後擔任大連輸入組合幹事、大連土木建築協會評議員、大連金融協會評議員、大連商工會評議員等公職。1946 年於長春設立山葉商會，從事家具製造販售業。參見竹中憲一編著，《人名事典「滿州」に渡った一万人》（東京：皓星社，2012），頁 1563。中國首本口琴教材是井奧敬一在 1927 年北京中華樂社發行的《初等口琴練習曲集》，此曲集作者井奧敬一在 1928 年曾赴北京師範學校演奏口琴。同年柯政和以井奧口授內容與他本教材為基礎，編譯發行口琴教材《口琴如何吹奏》。參見尾高曉子，〈兩大戰間期中日ハーモニカ界にみる大衆音楽の位置づけ〉，《東京藝術大学音楽学部紀要》，33（東京：2007），頁 21。

刷出版和樂器製造銷售為一體的綜合企業。至四〇年代則從著述序言得見與酒井悌（昭和期教育家、大東文化學院研究科畢業，歷任北京師範大學、輔仁大學、北京大學教授）、江鬪章（前外務省文化事業部官員）、篠原次郎（退役陸軍中將）、太田美代治（身分不詳）等政經文化人脈，其他得由柯政和各階段參與之活動組織推測，大抵圍繞著音樂教育而建立關係，日人來往對象的背景較顯多元，涉及商界、軍政界人物。⁴⁰

經過一九二〇年代的沉澱，三〇年代柯政和再度出現於臺灣報刊上的臺人行旅文字中，以成功的文化界人士姿態現身，成為臺人訪問北京的重要洽繫對象，也為促進中日親善論述的人物代表。由前文討論可知，柯政和視北京為推動中國音樂教育的發揮空間與文化資本，其具公費留日的經歷以及於北京耕耘音樂教育多年的背景更讓柯政和戰時備受日方重用；一九一〇年代柯政和留日時曾撰文敘述北京作為中國首都，是學術文藝的中心，已見他對北京潛在的文化嚮往。⁴¹ 1922年柯氏自東京音樂學校畢業後，轉任北京師範大學教授鋼琴、小提琴和曼陀林，學習國語，改名柯政和。赴京原因雖未見柯政和本人說明，但有一說為柯政和不願在日本治理下的臺灣發展，此說法實需商榷；⁴² 縱觀一九一〇年代中葉以來的音樂活動，柯政和多次參與由日人 1898年創立的臺灣基督教青年會的慈善音樂會，第二次留日則就讀耶穌會創立的天主教大學上智大學、以西樂教育為主的東京音樂學校，可見其音樂經歷與西方文化的淵源。對西樂與音樂教育抱持熱忱的柯政和，其赴京原因亦應有推廣西式音樂的理想使然。而 1923年 7月甫升格的國立北京師範大學或因改制擴編而有師資人才需求，故 10月即聘用已來京活動的柯政和。

赴京後，柯政和克服不諳中文的困難，展現全能的音樂家天賦與教育心志，活躍於音樂教材編纂、社團組織、刊物創辦、音樂會等活動。旅京期間，他更先後引薦郭柏川、江文也、林朝權等臺籍人士進入北京校院各領域任職，為連結日治時期

⁴⁰ 柯政和在北京的中國人、日本人之人際網絡及各人物介紹，參見胡旖旎，〈對《標準樂理教科書》的介紹與評價〉，頁 27；李岩，〈朔風起時弄樂潮〉，頁 37；問楚寒，〈《新樂潮》之“新”〉，頁 36-41；柯政和，《中國人的生活風景》（東京：皇國青年教育協會，1942），〈序言〉，頁 3-4；王歡、楊賀，〈音樂書商——柯政和中華樂社經營理念研究〉，《學習與探索》，9（哈爾濱：2021），頁 189-191；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頁 308、728、779-780、2440、273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數位資料庫」；日外アソシエーツ株式会社，「WhoPlus」（<https://web.nichigai.jp/nos/nweb/login/>，2023年 7月 20日檢索）。

⁴¹ 柯丁丑，〈臺灣の劇に就いて〉，頁 61。

⁴² 「1922年 8月不願在日本或日據下的台灣發展，赴北京教授鋼琴、小提琴、聲樂與曼陀林，1923年 10月受聘於北京師範大學。」薛宗明，《臺灣音樂辭典》，「柯政和」，頁 193。

旅京臺灣知識分子社群的重要人物。陳逢源 1938 年的行旅記述《新支那素描》便強調柯政和在北京文化界的影響力，戰時的柯政和緣其文化盛名與留日背景，日方延攬他兼任新民會中央指導部委員和北京特別市總會事務局次長，欲建立中日親善的文化橋樑。期間柯氏更曾邀請江文也擔任新民會藝術顧問，江文也以致力作曲、對政治工作不感興趣拒絕。⁴³ 由戰前柯政和的北京活動，可見他串接起戰前旅居北京臺人文化圈與訪中臺灣知識分子的聚合意義；而這一非常時空的臺人社群聚合現象實具時代的特殊性，若非其殖民地出身的成長背景與社會資本實難達成，柯政和之例呈現兩岸流動而連續的臺人漂泊者身影，並構成一跨境聯繫網絡的文化社群。

三、中國的性格：論柯政和《中國人の生活風景》與 《中國の社會風景》之社會觀察

一九四〇年代柯政和所著二作皆以「風景」命名，透過風景的呈現可以得知擷取畫面的文化屬性、作者感官與情感狀態，甚至是世界與我們的關係。⁴⁴ 柯政和序言自述《中國人の生活風景》（《中國人的生活風景》）、《中國の社會風景》（《中國的社會風景》）為姊妹作，「生活風景」與「社會風景」為一體兩面，生活為社會的縮影，社會是生活的延長，兩者共同組織一個國家的性格。⁴⁵ 故這兩作必須一併觀察，方能瞭解柯政和的中國經驗和文化視域。

（一）比較視域下的民族「風景」

北京的能量在於其空間內的文化交流與融會，且在國族文化認同上對日治時期的臺灣人具有強烈吸引力，故此間許多臺灣文化人先後奔赴，柯政和亦為其中之一。柯政和 1922 年由日本轉居北京，翌年受聘北京師範大學，致力音樂教育領域，1937 年後持續活躍於日本勢力下的北京。身為音樂教育者與新民會要員的柯

⁴³ 吳韻真，〈伴隨文也的回憶〉，收入劉靖之主編，《民族音樂研究第三輯：江文也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92），頁 27。

⁴⁴ 卡特琳·古特 (Catherine Grout) 著，黃金菊譯，《重返風景：當代藝術的地景再現》（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頁 3。

⁴⁵ 柯政和，《中國の社會風景》（東京：大阪屋號書店，1943），〈前言〉，頁 1。

政和於 1941、1943 年陸續撰述《中國人的生活風景》、《中國的社會風景》，前作出版者為皇國青年教育協會，後作出版者為大阪屋號書店，皆於東京發行，販售範圍擴及日本、滿洲、中國、朝鮮等地。⁴⁶ 同時期臺灣發行的《民俗臺灣》亦有相關書籍廣告，可知臺灣亦為銷售處。⁴⁷ 序言致謝友人酒井悌、江鬮章、郭柏川、篠原次郎、太田美代治等五位日、臺人士的協力，另顯柯政和專著出版背後的政經文化人脈。兩作序言皆不脫為求建設東亞新秩序，致力促進中國、日本雙方真實面貌的文化理解之時代話語，亦流露打破國族劃分以重組文化的漂泊者敘事意識：

我的夢想是……希望讓日本的人們清楚理解中國與中國人的真實。作為年輕時在日本學習、生活且由衷喜愛日本的中國人，始終哀愁的看待這二十年來日本與中國因對立所存在的距離。……遏止日本人們抱持著如旅人記述裡對中國與中國人過於奇異的認識。對新世紀啟動後的中國與中國人，得以有中國歷史、民俗基底的正確理解，清楚建構新中國與中國人真實面貌的知識。⁴⁸

市面上已有日本人、西洋人介紹中國的眾多著作。中國地大物博且社會極其複雜，若論介紹中國真是十分困難。尤其是中國的內部生活，若僅止於自己體驗來進行闡述，無異於單單在路上所聽聞般的瞎子摸象。雖然我是從自己的生活體驗之中，選擇尚未介紹給日本的面向來寫，但仍

⁴⁶ 大阪屋號書店的創立者是曾任臺灣總督府職員的濱井松之助（1874-1944），濱井掌握日俄戰爭的契機於 1904 年底在營口市成立雜貨商行，1905 年轉型為專門販售日本書籍、雜誌的大型連鎖零售書店。大阪屋號書店以東京、奉天、京城為據點，作為海外代理書店，向滿洲和韓國各地的日本書籍和雜誌的零售商提供書籍。一九一〇年代業務範圍擴及出版業，於中國、韓國、俄羅斯等地出版大量書籍，是與日本帝國勢力興衰與共的商業組織。湯原健一，〈大阪屋号書店小史〉，《愛知大学国際問題研究所紀要》，153（名古屋：2019），頁 87-124。相關出版資訊，根據筆者所藏二書出版頁所載，《中國人の生活風景》記為 1942 年 5 月 20 日初版發行，1943 年 12 月五版發行，並能得知第五版共印刷 1000 本。然 1943 年 11 月 1 日《民俗臺灣》廣告內文所述《中國人の生活風景》為昭和十七年（1942）二月再版，以及查詢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目錄後，第一版出版時間應為 1941 年；《中國的社會風景》為 1943 年 2 月初版發行，共 3000 本。《讀賣新聞》1943 年 3 月 11 日第七版刊登《中國的社會風景》書籍新刊廣告。讀賣新聞，「ヨミダス歴史館」（<https://database.yomiuri.co.jp/rekishikan/>，2022 年 12 月 10 日檢索）。

⁴⁷ 編者，〈文献紹介〉，《民俗臺灣》，3.11（臺北：1943），頁 44。

⁴⁸ 柯政和，《中國人の生活風景》，〈序言〉，頁 1-2。

會努力的由中國人的立場來觀察，且公平、忠實的書寫中國。⁴⁹

所謂「新世紀啟動」實指日本的東亞新秩序建設，柯政和著作動機乃感於當前所見中國與日本的對立狀況，希望向日人介紹真正的中國社會，排除偏狹的獵奇認識，同時反映讀者設定為日人。後作序言則表露柯政和執筆立場是中國人本位，寫作態度力求公正客觀，內容雖出於自己的中國經驗卻非隨筆漫談，從其目錄可見其聚焦中國社會生活各面向，愈加扣緊北京在地觀察。

依據人們如何實地遊覽、體驗、勘察或閱讀、談論、描述，「風景」成為認同形成的載體，在意識形態的語境中被創造。⁵⁰ 然以「風景」為名的二作並非呈現地貌風光，《中國人的生活風景》觸及中國民族的姓氏、禮節、民族性、人際往來、家族關係、料理，以及小費、考試制度、肢體動作、奴僕（底下人）等獨特文化，內容廣泛多元，概由「民族」角度出發介紹中國文化；《中國的社會風景》雖同樣介紹中國人的食衣住行、休閒娛樂、階級思想、俗諺格言、民間故事等文化特色，但書籍後半則為北京在地風物的專節記述，包括乞食文化、天橋娛樂、慈善事業、市民、義和團等章節；前半章節雖名中國亦多論及北京狀況。書末另有中日兩國文化生活特性的差異說明、探討鴉片之於大東亞建設的影響，以及駁斥日人杉山平助反對中日通婚〈別和中國人結婚〉的論述。整體而言，《中國的社會風景》較《中國人的生活風景》內容更凸顯、深化北京在地特色，呈現作者旅居北京多年的生活經驗與文化所得。若言風景是歷史、文化、社會等客觀背景，結合記述者心理、感官狀態的聯繫詮釋，前述二作顯然由宏觀的民族視野，逐漸聚焦至地方式的微觀表現，折射出柯政和進出各文化層次差異的漂泊主體視域，包含心理建構、觀察和思考的方式。

《中國人的生活風景》偏向中國群體文化制度、風俗與生活樣式的介紹，由姓氏切入呈現中國社會緊密的家族關係，內容著重說明人際往來間的儀度規範，論述基調力求破除中日彼此的誤解，迎合一九四〇年代促進中日親善的時局氛圍。至於寫作手法特性：其一為章節開篇所安排的序言，多由作者視角或生活經驗分享切入，比如〈中國人的名片〉所論：「或許是因為年紀增長而感於近代生活的疲憊，我越來越覺得社交過程中亂用名片的狀況愈趨嚴重。」⁵¹ 柯政和不直接解釋中國

⁴⁹ 柯政和，《中國的社會風景》，〈序言〉，頁1。

⁵⁰ 溫迪·J·達比 (Wendy Joy Darby) 著，張箭飛、趙紅英譯，《風景與認同：英國民族與階級地理》（南京：譯林出版社，2018），頁74-75。

⁵¹ 柯政和，《中國人的生活風景》，〈中國人的名片〉，頁45。

名片而先分享個人生活經驗，不僅藉以引起讀者共鳴，也能強調每章的介紹價值，增加可讀性；其二為各章節中穿插或於最末總述比較中國與日本各面向的文化差異，如家族制度、宴會禮儀、愛國心、料理等觀念；其三為以片假名拼音中國詞彙。上述三點顯示柯政和面向日本讀者的寫作意識，與其取材的生活化特質；特別的是，柯政和會說明中國不同地域的文化差異和特色，以及北京獨有的文化習慣，如北京、南京兩地的小費比例、氣候差異所致「南頭北腳」概念。柯政和引述日文諺語「所變れば品變る」（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認為中國地方色彩顯著在風俗、習慣、禮儀、飲食、發音等面向。⁵²

此外，作者於〈中國人的氣質〉提出介紹中國的外國著述雖多，卻往往淪為坐井窺天的偏見而妄下定論，導致諸多誤解而阻擾理解。面對當時中國龐大四億人口的考察，柯政和認為即便著者接觸了各階層民眾、融入當地生活仍會有所不足，每一個體仍受性格、教養與環境的影響，而具殊異面貌。基此，柯政和強調《中國人的生活風景》是以中國人立場出發，劃定中層階級之生活型態為重點，由實際社會生活掌握中國民族特質的傳統與改變。⁵³ 柯政和亦會扣合時勢來說明當時中國文化習慣的變化趨勢與原因，如「姑娘」一詞本為尊稱優渥家庭的女兒，因近年流行於藝娼妓的稱呼，中國民眾逐漸改用「小姐」。⁵⁴ 可知《中國人的生活風景》內容利於讀者掌握當時中國社會動態，亦見柯政和視角的敏銳度與時代感。

類似筆觸同見於〈中國的家庭風景〉一章，柯政和以家族封建、奉親、奴婢制、子嗣的角度解釋中國多妻傳統的產生其來有自，試圖破除多妻等同享樂主義的誤解，且論及民國後民法改正與多妻弊害已令中國人展開矯正的現況；⁵⁵ 〈愛國心與愛心鄉〉小節則提到與日本國情殊異的兩大現象：中國海外團結的華僑、北京各省會館林立之愛鄉心特質，進而扣連中國道義精神得以助於實現東亞王道的意義，嘗試泯除日中兩國差異以達互補的論述脈絡，回應一九四〇年代大東亞文化與民族統合的政治氛圍：

今日中國社會各方面持續發揮著道義精神，且此精神是純然東亞所固有的，故今後該逐漸發揮此精神以促進王道的實現。……從建設東亞新秩序的立場考量，往後中日兩國為求復興、發揮東洋固有文化的同時，雖

⁵² 同前引，〈中國人の敬稱〉，頁 24。

⁵³ 同前引，〈中國人の氣質〉，頁 55-59。

⁵⁴ 同前引，〈中國人の敬稱〉，頁 22-23。

⁵⁵ 同前引，〈中國の家庭風景〉，頁 87-95。

然應擷取西洋文化之長，然從前埋首盡向西洋文化看齊的作法是不對的。⁵⁶

前述內容除彰顯柯政和基於中日比較視域的論述，也對應他致力促進中國、日本文化理解之著述初衷，論述大至社會禮儀制度，小至肢體動作與生活細節：「日常生活中的手指動作和語言是一樣的，對疏通、理解彼此的想法是必要的存在。」⁵⁷「中國人在日常會話、演說及文章經常引用俗諺或格言。若能多少懂些俗諺、格言是有利於與中國人打交道的，也能知道中國的人情風俗。」⁵⁸此外，他將中國風景視為對美好往昔的在地沉澱物，一方面強調優點外，也對那些被現代大眾所屏棄的中國弊病展開解釋、修正與改善，加強中日兩國於東亞合作的可能空間與理解。如〈中國人的階級思想〉論及民國後共和體制打破君主專制所形成的階級思想，⁵⁸又或如〈中國料理之種種〉談到中國人三大理想為娶日人為妻、以西洋館舍為屋、享用中國料理，延續中日親善的論調。⁵⁹

《中國的社會風景》前言提到生活為社會的縮影，社會是生活的延長，可知此書性質乃延伸《中國人的生活風景》內容。首章〈關於中國的國號〉說明「支那」來由源於波斯人、印度人對中國通稱 China 語音的漢字，世界諸國乃依此稱呼中國，然事變之前中國政府曾向日本要求將支那改為中華民國。柯政和解釋「支那」二字易被意會為日本人支配、奪取中國的意涵，考量現階段中國與日本是必須團結以完成大東亞建設的協力夥伴，彼此稱呼正確國號才是上策。且作者更引述日本為國家於英語詞彙的正名經驗與《東亞新報》修訂中國國號的實例，加強中國正名的合理性與同理心。⁶⁰相較於前作《中國人的生活風景》部分章節仍見「支那」詞彙，《中國的社會風景》已一律使用「中國」，於此顯現柯政和中國文化認同的取向。《中國的社會風景》作為介紹中國樣貌的後作，除了延續日中比較視域外，另強調中國既有文化對社會安定的影響與東亞文化復興的價值，回應當時戰線南移的日本力求華北政治安定的權衡：

大東亞建設的目標是排除在東亞的英美侵略勢力，而得以回歸東亞秉

⁵⁶ 同前引，頁 100-101。

⁵⁷ 同前引，〈指の表情〉，頁 263；柯政和，《中國的社會風景》，〈俗諺と格言〉，頁 131。

⁵⁸ 柯政和，《中國的社會風景》，〈中國人の階級思想〉，頁 109。

⁵⁹ 柯政和，《中國人の生活風景》，〈中國料理のことなど〉，頁 160。

⁶⁰ 柯政和，《中國的社會風景》，〈中國の國號について〉，頁 3-5。

性。為了達成此目標，一同解放東亞，必須復興東亞固有文化。所謂固有文化當然包含文獻所記事物，然而最清楚可解的還是自古以來代代相傳的戲劇內容。若說文獻是理論，戲劇則如標本般可讓人一目了然。自古流傳下來的戲劇約莫三千種。若分析研究之，我認為必能掌握古來文化的凝結精華。由此點考量，中國戲劇不僅是藝術或者是社會教化的工具，而是東亞文化復興的重要關鍵。⁶¹

上述引文出自〈觀劇介紹〉，此節詳述國劇、崑曲、評劇發展源流與當政者、民眾的關係，說明中國戲劇藝術呈現寫意偏向、觀劇習慣等雖與日本相異，卻為中國重要的社會教化工具且富深刻藝術價值，更搭配東亞文化復興的國策，藉以策動、勸說讀者對中國文化的接受。

空間與社會關係互為生產，中國二十世紀以降的現代化歷程和時代裂變幾乎都在北京留下線索，將「北京」作為觀察中國的首要窗口並不為過，且北京的意義之一便是其所沉澱積累的歷史想像。⁶² 柯政和《中國人的生活風景》、《中國的社會風景》二作雖冠名「中國」，但內容多以北京為敘事核心或以補述筆法比對添註，前者如食物、休閒娛樂、建物概以古都北京發展為最，後者如音樂、戲劇、品茶等以北京為匯聚地的特色發展。此寫作特質一則凸顯北京之於柯政和的文化象徵意義，二則顯露柯政和中國視域或生活經驗的侷限，卻也順勢搭上中日戰爭後日本掌控北京的時局。柯政和的著述視線投射了當下他對中國社會的觀察，但其指涉卻屬於過去的中國，是對往昔光影不斷地重述與修飾。空間的打造與修改是人類重要活動，柯政和筆觸的中國「風景」並非地理空間的客觀表徵，而是結合多年旅中生活面臨主政勢力更迭的人文觀察及生活心得，亦是久處離散情境下臺人的政治敏銳度與文化傳承。

(二) 中國社會結構的性情傾向與調節

依據社會結構、城市性質、經濟文化面貌，北京發展分為四階段：封建統治中心的「帝京」時期（1911年前）、北洋政府所在地的「舊京」時期（1911-1928）、

⁶¹ 同前引，〈觀劇案內〉，頁 91-92。

⁶² 王德威，〈北京夢華錄——北京人到臺灣〉，收入陳平原、王德威編，《北京：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363。由於政治和文化領域的特殊地位，北京的域外形象相當程度代表外國視野的中國形象。王升遠，《文化殖民與都市空間：侵華戰爭時期日本文化人的“北平體驗”》（北京：三聯書店，2017），頁 6。

首都南遷後文化古都的「北平」時期 (1928-1949)、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的北京時期。⁶³ 北京雖然在 1937 年 7 月被日軍佔領，但作為中國文化的代表古都且名義上未與中國分離，日本無法如殖民地般全面實行文化、語言的殖民化。因此，戰時北京的中華文化成分相對於東北滿洲、臺灣等地，仍具有一定的發展空間。⁶⁴ 柯政和認為北京是中國多年來的首都，來自各地的文化聚集在此混同、交融，並在地化。加之 1922 年起居於北京的柯政和歷經北洋政府與日本勢力的統治，致其筆下的「中國」呈顯新舊交織且持續變動的結構樣態。

柯政和通常藉由民情習俗或社會性規範予以解釋社會運作的邏輯，說明中國面臨生存情境變化之際仍保有固有社會結構的「性情傾向」(disposition)，⁶⁵ 致其行文圍繞於比對中日文化特質，而聚焦文化範式的形成與情境調節。如〈中國的考試風景〉敘述日人看待中國社會的驚扭源於差異的民族性：「在純白的四角形中央印染著純紅的圓，對那些與日之丸旗一模一樣的日本人性格而言，中國的社會樣態實在太過於複雜奇怪而難以呈現。」⁶⁶ 行文除表現出中日民族本質的差異，此文文末更將現代化浪潮中視為迂腐、無益的科舉進行意義轉化，視之為對自詡彈性佳、善於通融的中國唯一舊制度的庇蔭。其他相似筆法也呈現於〈支那澡堂的極樂氣氛〉一節，由入浴觀念、澡堂規制、交際意義、光腳態度等探知中日相異的國民性，同時呈現現代化之後混浴的改變。⁶⁷

在化解中日文化隔閡的敘事基調中，柯政和更嘗試呈現 1937 年事變前後中國的相異樣貌和積極變革：如礙於局勢變化後的物資短缺、物價暴漲及經濟壓力，促使女性由消費者轉變為生產者的角色，投入產業生產的自覺與實踐；又如伴隨新體制的來臨，加諸物價高漲、生活自肅的社會局勢，柯政和建議應廢止中國飲食的奢侈料理，轉向獎勵營養充分且便宜的料理；事變後環境變遷、人口增加致使交通問

⁶³ 楊東平，《城市季風：北京和上海的變遷與對峙》（臺北：捷幼出版社，2006），頁 69。

⁶⁴ 張泉，〈張深切移居北京的背景及其“文化救國”實踐〉，《臺灣研究集刊》，92（廈門：2006），頁 81。

⁶⁵ 皮耶·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認為社會化特色在於慣習 (habitus) 的形成，慣習指涉了一套知覺、評價和行動的內化範式系統，是場域邏輯社會性地體現在身體之中的歷史孕育物。而社會生活應該被視為社會結構、性情傾向 (disposition) 和社會行為交織而成的相互作用，以精神和身體等形式所呈現的性情傾向形成乃與社會情境有關，生產出人們實踐、感知與態度的規則性，亦會隨著社會施為者的生存情境進行調節與重構。朋尼維茲 (Patrice Bonnewitz) 著，孫智綺譯，《布赫迪厄社會學的第一課》（臺北：麥田出版、城邦文化，2002），頁 98-118；鄭祖邦，〈對布迪厄社會學知識進展的考察〉，《社會理論學報》，6.1（新加坡：2003），頁 109-115。

⁶⁶ 柯政和，《中國人の生活風景》，〈中國の試験風景〉，頁 255-256。

⁶⁷ 同前引，〈支那風呂の極樂気分〉，頁 233-236。

題頻繁發生，柯政和認為起因於中國資產階級的特權心理、路權不明、民眾交通知識貧乏。至大東亞戰爭發生後汽油管制雖讓汽車使用量下降，人力三輪車車禍數量反倒上升，然若以貧民救濟、節約石油的角度而言，人力車實有其存在價值；甚者，居於北京的日本人亦有入境隨俗的生活習性變革，如〈中國的衣食住〉描述日本領事館考量北京禮俗露趾為失禮，而禁止日人裸足外行；⁶⁸ 或〈奴僕的種種〉此節柯政和引用自家僕人的訓練經驗，探討因語言風俗與工作訓練有別，致使在北京的日人聘僱使喚僕人有著普遍的內在困難與不同風格。⁶⁹ 文中特別提到在北京的日人家庭較易陷入不顧僕人心情的缺失，身為新東亞指導者的日本人應當斟酌中國社會秩序未全的聘僱方式，和中國人氣質、禮制階級、主從男女有別等文化特性。

文化傳統多在承認差異的狀況下建構而出，離散的生命情境更提供柯政和差異性的警覺。⁷⁰ 《中國的社會風景》各章雖強調事變後或大東亞戰爭爆發後的中國轉變，卻也記錄中國固有的階級序列及廣大國土地域差異所導致的文化異貌，諸如服裝、主副食、建築、纏足等文化源流與發展；⁷¹ 此外，書中亦抱持中國歷史文化傳統應獲保留或重視的理念，如柯政和於〈欣賞音樂的方法〉善用己身音樂教育所長，洗刷外界對中國音樂糜爛、亡國曲調的誤解，分就戲劇音樂、純音樂推崇新中國音樂的建設；⁷² 〈觀劇介紹〉則惋惜日人對中國戲劇缺乏先備知識而無法盡興欣賞的缺憾，稱許中國戲劇的獨特藝術氛圍；⁷³ 《中國人的生活風景》以〈中國人的氣質〉介紹中國人的民族特質，包括家族主義、忍耐、沉著、知足、禮儀、委婉、勤勉、節儉、友情、愛面子、頑固。⁷⁴ 前述列舉顯見柯政和對中國人民族性的正面評價，敘事中雖言中國人亦具種種缺點，但僅提出最顯著的是頑固一項，並依此提出對中日親善的宣傳建議：

⁶⁸ 柯政和，《中國的社會風景》，〈中國人の衣食住〉，頁 19。

⁶⁹ 柯政和，《中國人的生活風景》，〈底下人のことなど〉，頁 273-274。

⁷⁰ 厄夫·錢伯斯 (Erve Chambers) 著，李宗義、許雅淑譯，《觀光人類學：旅行對在地文化的深遠影響》（臺北：游擊文化，2019），頁 196-197。

⁷¹ 論者指出中國文化以倫理為本位，「衣冠之治」下衣冠服飾作為民族的識別特徵，實是倫理政治化的象徵，表現了中國文化的身分、品格、審美等結構性特點以及民族形象的內在性格。郭洪紀，《文化民族主義》（臺北：揚智文化，1997），第 2 章，〈文化民族主義的主要觀念〉，頁 80-81。

⁷² 柯政和，《中國的社會風景》，〈音樂の聽き方〉，頁 55-74。

⁷³ 同前引，〈觀劇案内〉，頁 77。

⁷⁴ 柯政和，《中國人的生活風景》，〈中國人の氣質〉，頁 55-78。

這項心理特質是無論政治工作或文化工作也好，都必須慎重考量的。若非發自內心，只是速求成效的強制性、一意孤行的推動，或許反倒會帶來反感和反效果的。再者，我認為文字或言語的宣傳究竟能對中國人起多大的作用是無法推論的。缺乏實際行動的宣傳對國民來說只是馬耳東風，不能期待會有效果。⁷⁵

柯政和認為政治與文化工作必須留意中國人頑固的民族性，由衷的推動國民宣傳，並且付諸實踐才能有所成效。而面對一九四〇年代的太平洋戰爭爆發，柯政和亦有相關協力言論。〈用籃子打水〉敘述在中國生活的日人要盡可能利用在地產物自給自足，以因應物資缺乏現況與符合大東亞建設的理念。⁷⁶

然而在協調中日文化差異與重視中國文化之外，也有柯政和針對中國習俗、規定或社會性規範的客觀評議。如〈中國人的階級思想〉、〈中國的刑法〉兩節雖言民國後階級、刑罰制度表面看似消失或有改善，相關概念實仍殘留於中國人的實際生活。前者為中日雙方依據職業化分階級的想法差異，後者為今日文明世界的社會大眾仍對司法抱持恐懼心理；⁷⁷ 另如〈愛鄉心與職業門閥〉則依據中國空間與歷史發展的特性，敘述中國人特殊的職業門閥現象，並以北京的職業現況作為實證。⁷⁸ 中國歷代動盪不安，各地人們為了自我生存，親戚、朋友、同鄉皆是團結自保的重要力量，發展事業時亦相對信任同鄉人，而對外人抱有防禦態度，如此心態與作法已形成中國大眾特殊的潛默契。皮耶·布迪厄定義慣習是種集體性的、持久的、規則行為的生成機制，受到個人歷時性社會化過程之影響，指涉了認知與行動的身心內化範式。⁷⁹ 柯政和的中國書寫可謂在大東亞建設藍圖的出版共相中，呈現源於歷史所形構的思維模式、行為傾向、認知風格等「性情傾向」(disposition)之中日差異，並嘗試於一九四〇年代戰爭時局下呈現中國生活風格的調整、轉化與理解。

前述潛藏在行動主體而關乎社會建構的性情傾向討論，同見於〈義和團餘聞〉撰文的問題意識：「我想談的問題是義和團為何祕密結社以及加害外國人的原因等

⁷⁵ 同前引，頁 78。

⁷⁶ 柯政和，《中國的社會風景》，〈籠で水を汲む〉，頁 178。

⁷⁷ 同前引，〈中國人の階級思想〉、〈中國的刑法〉，頁 109-110、127。

⁷⁸ 同前引，〈愛鄉心と職閥〉，頁 103。

⁷⁹ 慣習是行為的結構性限制，同時是行為的生成模式。朋尼維茲，《布赫迪厄社會學的第一課》，頁 98-101；鄭祖邦，〈對布迪厄社會學知識進展的考察〉，頁 110-111；徐賁，〈布迪厄論知識場域和知識份子〉，《二十一世紀雙月刊》，70（香港：2002），頁 76。

等」，⁸⁰ 柯政和認為民變的發生必定有中國人民無法忍受的帝國主義暴行，導火線尤其是白人以宗教作為手段侵略中國城市和鄉村，促發中國民族危機的背景。對於宣教人員的治外法權與信仰者的狐假虎威，中國良民只得參加地方民間組織義和團反抗天主教、基督教的信徒和宣教師。義和團結社與民變凸顯中國面對外來勢力的強行壓迫、向來以地方為組織的文化慣習，以及當時無能為力的封建政府。柯政和以義和團為前車之鑑，期盼為政者勿倚賴武力達成目的，東亞新秩序的建設更切勿重蹈覆轍。此用筆之意亦見於〈關於鴉片與麻藥問題〉關於鴉片戰爭的討論，作者一邊強調西方各國對近代中國的軍事、外交衝擊與欺侮所致的中國人仇外心理，一邊則藉感謝 1942 年初日軍攻取香港，重申務除外國勢力危害中國民族的物質、身體、精神方面遺毒，最末回扣華北作為東亞解放戰時基地應根絕鴉片與麻藥，以解決財源、勞動力與食糧問題等訴求。⁸¹

時任新民印書館編輯部長的安藤更生，形容事變後的北京由千年古都蛻變為興亞基地的近代都市。⁸² 柯政和〈中日攜手之各面向〉直言事變以降日本以掌控華北為目標，居留北京的日人人數達十一萬人，日常生活、性格、風俗等文化持續交流。基此，柯政和此章專就北京日常見聞調查五年以來中日交流現況，層面囊括語言、文化、生活、人才、政治等項目的流通。⁸³ 尤見日人進駐北京、大東亞戰爭的時勢影響，柯政和認為此加強了中日國際情感的培育。另外，柯政和主張中日文化交流首重語言，可見他對中日語言理解的要求。⁸⁴ 故此章語言部分補充談到上海、香港等地外來語的混用，喚引出抵抗英美的大東亞共榮圈意識：

過去百年間英國人不僅榨取中國人，也實行文化侵略，由皇家、大英地界等詞彙使用可知中國人腦中已深植英國崇拜的思想。我們不該只是將英美人從我們的東亞驅除出去，也必須清除這些被英美所深植的錯誤思

⁸⁰ 柯政和，《中國的社會風景》，〈義和團餘聞〉，頁 235。

⁸¹ 同前引，〈阿片及び麻藥問題について〉，頁 273-310。

⁸² 安藤更生編，《北京案内記》（北京：新民印書館，1941），〈序〉，頁 1。

⁸³ 本章共列十六種項目，包含職業婦女、宴會與藝妓、日本歌曲、中國歌曲、日本語、中國語、日籍教師、官吏任用、中日通婚、咖啡茶房、日文電報與郵政換匯、日式房屋、飲食、休假與津貼、中日生活樣式、語言等，呈現中日文化在北京日常生活的相互影響。柯政和，《中國的社會風景》，〈中日握手の種々相〉，頁 241-254。

⁸⁴ 編者，〈華北教育家座談會〉，頁 53。

想。⁸⁵

〈中日兩國人的習慣差異〉接續於〈中日攜手之各面向〉章節後，內容主述為黃種人的日本人與中國人於日常生活上習慣或規範的差異，包括上下座區別、飲食料理、行走姿態、訪客應對、處世方針、人際往來等表現。柯政和一方面指出國情差異的背景，另一方面得知中日兩國國民性保守、進取之別，頗具補充中日衝突原因的分析用意。⁸⁶

《中國的社會風景》最末為〈不用害怕與中國人結婚〉，此文為柯政和反駁1938年杉山平助〈別和中國人結婚〉所寫，杉山認為異國婚姻固因雙方氣質、經濟、語言、風俗差異而難以成功，且以日人妻子多數不幸福與混血兒危害日本民族基礎為反對理由。⁸⁷ 柯政和留日期間結識日籍妻子，本身即中日通婚的經歷者，自然對杉山平助所論感到不滿，同年5月即投稿《主婦之友》撰文〈關於日華之間的婚姻〉公開辯駁，並獲杉山於東京朝日新聞發表欲與之在北京對話的回應。柯政和解釋由中日親善、東亞和平、文化提攜等因素，中日國際結婚應被大大獎勵，並於書中摘錄來自日人男女的來信回饋支持己見。⁸⁸ 陳逢源也曾批判杉山平助的中國觀是極其淺薄的，評價著作《支那、支那人與日本》(1938)只是應時之論，批評自稱訪京踏查一個月的杉山視野狹隘，盡是流連舞廳而未深入中國生活現場考察。⁸⁹ 就內容而言，柯政和《中國的社會風景》末四章已非中國生活片段的擷取介紹，而屬於文化專論，緊扣中日親善、差異適應議題，並各以民族、個人立場思辨近代中國面對帝國內外壓迫的抵抗與心理養成。此四章可謂柯政和中國書寫的真意與結語，即時代變動與中國社會行為範式間的落差與調節，實需中日兩方共同弭平。

整體而言，柯政和的中國敘事固然受到一九二〇年代以來的生活經驗所影響，但時局境遇則界定了敘事題材。他利用中國社會的日常象徵符號、文化儀式、修辭、制度和視覺影像，形構殖民政權生活下的文化政治表述。《中國人的生活風

⁸⁵ 柯政和，《中國的社會風景》，〈中日握手の種々相〉，頁254。

⁸⁶ 同前引，〈中日兩國人の習慣の差異〉，頁257-269。

⁸⁷ 杉山平助1938年夏曾訪問北京一個月，針對中國人氣質與性生活進行觀察，也與精通中國事務的友人交流意見。杉山平助，《支那と支那人と日本》（東京：改造社，1938），〈支那人と結婚するな 支那人の家庭生活について〉，頁67-114。

⁸⁸ 杉山平助和柯政和之間的文章辯論過程與觀點，參見柯政和，《中國的社會風景》，〈中國人と結婚することを恐れるな〉，頁313-333。

⁸⁹ 陳逢源，《新支那素描》，〈柯政和和其他〉，頁101。

景》、《中國的社會風景》章節皆圍繞於人際關係延伸的文化規範、社會變遷、心理層次之議題，藉以闡述中國人的社會行為形構；然前作聚焦群體於各式社會情境的人際層次，後作則以個體生活行事為主軸，頗具以北京在地光影表象中國真貌之意味，兩作內容互補。總而言之，柯政和的論述呈示中國文化是由個別彼此聯繫，同時又相對獨立的中國各區域所混融構成，亦是種歷史與空間環境交互作用的歷時性形成。⁹⁰ 意即社會結構的價值範式、社會性格並非凝滯不變，柯政和強調隨地域歷史、北京政權、中日事變、西方勢力等情境變動，部分社會結構呈現了調整及重構的狀況，凸顯中國民族性與生成的社會環境、文化風俗之交互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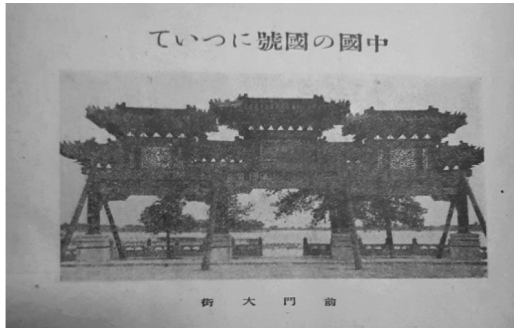
(三)生活空間的踱步：論章節前的中國風景圖說

柯政和的中國風景系列二作除了大量文字、少許插圖，各章節前另輔以照片、圖繪與簡要圖說。照片出處比對後，可以確認部分照片與 1941 年安藤更生出版的《北京案內記》雷同，為日方政府單位所屬人員攝影。⁹¹ 每個影像都是一種觀看方式的具現，其意義亦取決於出現的上下文。⁹² 故由照片的陳列選擇亦可考察當時兼任新民會中央指導部委員和北京特別市總會事務局次長的柯政和之敘事策略，別具文本探究價值。加之這些章節照片的「生活風景」並不一定與接續章節有所呼應，卻透過具體的風景、物件、人物圖像、活動場景，組構出足以辨認的空間——中國，得交叉展現柯政和對中國生活的重現與解構。柯政和二作總計 37 章，合計佐附 36 張照片與 1 張圖繪（參見附錄），畫面包含自然風景、人像、生活物件、節慶活動、建物空間等單頁素材（見圖二～九）。當中以場景搭配人物作為畫面主軸者佔 13 張為最多，次者為建物空間 11 張；相較於《中國人的生活風景》僅出現

⁹⁰ 柯政和《中國人的生活風景》與《中國的社會風景》二作論述近似於和辻哲郎的風土論，皆重視對日常生活的觀察，並主張文化是人與地理風土互動的結果，具有國民性的問題意識。和辻哲郎 (1889-1960) 是日本文化哲學家，日本歷史文化、歐陸哲學、時局國策的影響促發其代表作《風土：人間學的考察》(1935) 的產出，核心觀點是風土文化論。然而討論和辻哲郎《風土》的中國觀，須得留意他並未清楚界定「中國」的範圍，故存有認知偏差。和辻哲郎風土論的內容主張與形成背景，參見譚家博，〈中國風土和人間的多元性：論和辻哲郎的《風土》的中國文化觀〉，《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19.1（臺北：2022），頁 8-18；朱坤容，〈和辻哲郎“風土文化論”成因淺析〉，《浙江樹人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6.6（杭州：2006），頁 116-121。

⁹¹ 編輯人曾記述資料蒐集感謝興亞院華北聯絡部、北京市公署觀光科、華北交通株式會社、東亞新報社、日本國際觀光局的協助。安藤更生編，《北京案內記》，〈序〉，頁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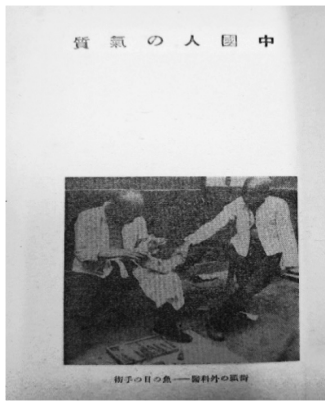
⁹² 約翰·伯格 (John Berger) 著，吳莉君譯，《觀看的方式》（臺北：麥田出版，2010），頁 12-13。



圖二：前門大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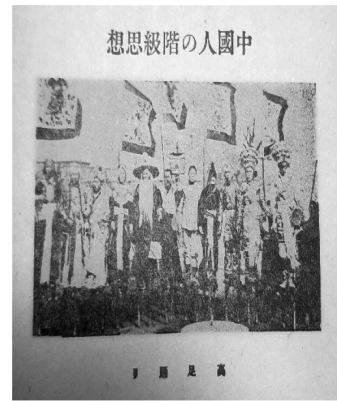
圖三：故宮博物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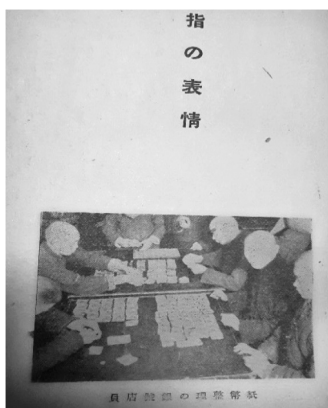
圖四：街頭的外科醫生



圖五：打水



圖六：踩高蹺



圖七：銀行整鈔員



圖八：救濟院的寢室



圖九：滿洲禮服貴婦

北京的琉璃塔、雍和宮，《中國的社會風景》所附北京建物、風景尤多，包括前門大街、萬壽山排雲殿、銅亭、玉帶橋、北海白塔、故宮博物院、昆明湖、天橋等，整體畫面如圖二、三般廣大宏偉。

「風景」若結合特殊意義的文化和歷史可以喚起身分意識，藉由某個地區或國家象徵性的影像，概括表現人們基於社會認同所引導的風景呈現。⁹³ 首先，柯政和圖像主要使用體裁是照片而非圖繪，已呈現他意欲客觀寫實中國的目的，即基於文化民族的認同意識如實表現中國生活風光，促進預設的日人讀者盡可能的認識中國。再者，照片與章節內容不見得相應的安排，加上圖說文字，則印證傳統敘事中風景照除了被視為現實世界的客觀存在，也為人們借景抒情或言志說理的媒介。⁹⁴ 就以數量最多的場景人物照而言，畫面呈現特性與建物空間的宏大展現存有差異：此類照片取鏡場景部分空間或聚焦活動為主，人物或單或眾出現而輔助畫面的定義，如廟會、茶館、下棋、踩高蹺、拾荒等照片，強化照片的日常性與真實性。

各章節照片、圖繪與主題記述不符或相符者，相符者自能推論是如圖五加強內容說明，進一步細究不符者則有延伸章節部分概念，或者全然無關的類型差別。延伸章節概念者或如圖七銀行整鈔員援引〈手指的表情〉的手指與點鈔動作，全然無關者例如圖四街頭外科醫生與〈中國人的氣質〉、圖六踩高蹺與〈中國人的階級思想〉等，且非孤例。題材性質以預設的日人讀者之文明視角與興亞立場而言，例如圖七整鈔員、圖八救濟院呈現中國經濟面與社會福利，但多數仍為大眾生活代表畫面，體現了服膺於帝國殖民現代性的政治性凝視。這些照片與章節內容的回應、抽離，及其所代表的生活風俗之儀式活動、人物選粹，彷彿對中國生活風景的文化脈絡所取樣的標本陳列；另由柯政和的中國文化認同而言，照片項目的涮羊肉、滿洲禮服、客房客廳、騾車等食衣住行，種種圖片除了是中國社會生活光景的複製與強化，也是一場北京在地文化儀式、新舊物件、經典景點的展演。這些照片圖說正為北京文化界要人柯政和文化再現與認定的憑藉，寄託他對中國生活與物景符號的懷舊情緒、認同和話語權，也重申中國正處於新舊變革的過渡期，中國以外人士必須觀其全貌，方能瞭解國民性與社會性格的形塑歷程。

回視《中國的社會風景》序文所言，柯政和力申寫作是就迄今的自我生活經驗選取尚未介紹的中國，從中國人的立場致力公平、忠實記錄中國社會的寫作意識。

⁹³ 卡特琳·古特，《重返風景》，頁 41-42。

⁹⁴ 陳陽，〈「地勢寫真畫」：民初風景照中的民族認同〉，《二十一世紀雙月刊》，165（香港：2018），頁 65。

可知柯政和的寫作侷限是出身殖民地臺灣的他，卻定位以中國人視角著述，以及他自身一九二〇年代方赴中發展，主要活動限於北京，且由部分章節圖文脫節的狀況，出版單位、時空情境皆顯見日本政治影響等條件限制，而凸顯柯政和「中國書寫」實存視域、地域、時代之有限性。客觀而言，《中國人的生活風景》與《中國的社會風景》並未描繪中國全貌，而是作者有意識揀擇文化主題，故著述意義顯現於長居北京的臺人觀察與中國塑造，特別是創造由民國北京到軍閥割據乃至日本侵佔後的中國樣貌。這些照片恰驗證了柯政和對中國文化符號的有意部署，敘事者的他藉由觀看確定自己置身其中的世界，寄寓自己的認知與信仰，持續確立中國認同。⁹⁵ 柯政和在文化、社會與物質面向上創造中國的地理空間，在讀者與敘事者之間以文字、照片交互組織中國的動態發展，甚而具有透過民族文化的濾鏡馴服凝視對象的意圖。因此，這 37 張照片不單牽涉柯政和多年的生活經驗與文化想像，也透過視覺景觀呈現作者生活和寫作的時空背景，襯顯己身在北京的地域視野。

照片是解讀時代、歷史的視覺文本，此文本運用可見《中國人的生活風景》與《中國的社會風景》於每章正文紀錄前，皆附社會樣態照片或圖繪，「圖文並茂」的讓人一窺中國實景樣貌的作法。風景可以代表某一個地區或國家象徵性的影像，呈現文化原型以及與世界的關連。⁹⁶ 柯政和二書所附之 37 張圖雖無法完全得知出處，但其缺乏排序規律及抽離章節的傾向呈現了尚未完全規格化的建構狀態，另表現出對舊日中國生活樣貌的徘徊踱步，以及柯政和並非土生土長中國人的經驗侷限。他的中國敘事實是開啟了以「中國」為想像單位的漂泊者文化知識生產，讓讀者依循他的安排以建構對中國文化的認同感與認識意義。且書中柯政和自我形象呈現亦受侷限，雖能從單節內容如〈不用害怕與中國人結婚〉看到他的思維，但相對更見他在中日親善框架下刻意保持中立的自我壓縮，追求客觀的執筆態度。北京作為柯政和主要的中國經驗空間，是他追尋文化身分的建構之地，然一九四〇年代東亞的時代脈動卻深刻左右他的寫作意識與取材，產出獨特的戰時中國敘事。這些中國「風景」的表面物景和文化象徵之觀看、詮釋甚或編排，呈示了柯氏否認己身來處且根著於中國文化認同，卻又被生活經驗與現時政治所束縛的闕境狀態。因此可見柯政和是恆常的處於時空錯置的文化框架中，致其敘事圖景始終與現居地中國存有距離。

⁹⁵ 觀看先於語言，也能確定己身的存在，觀看乃涉及圖像事物與我們之間的關係。約翰·伯格，《觀看的方式》，頁 10-13。

⁹⁶ 卡特琳·古特，《重返風景》，頁 42。

四、結論：民族風景的文化眷戀與生產

隨風景而生的事件、歷史、觀點、體驗構成了社會地理學的議題，⁹⁷ 也成為旅中臺灣知識分子柯政和書寫中國的素材，以及文化資本、身分認同的創發場所。因為殖民地臺灣教育的機運，柯政和由臺灣赴日求學，輾轉任職北京高等校院，投身於中國近代音樂教育事業至戰後不輟。1945年前他更引薦臺灣文化人至北京擔任教職，形成一他所建構的旅居北京臺人的文化社群，在地緣、政治力量交錯的中日關係內持續發揮影響力。在所謂新中國音樂活動之外，雖得見柯政和與臺人網絡的聯繫往來，然論究一九四〇年代《中國人的生活風景》與《中國的社會風景》系列作，其著述圖文卻全然未見故鄉臺灣，論述視域著力比對中／日或是西洋／東洋的文化差異。文化是發生在人與人之間的過程，並呈顯於流動之際。⁹⁸ 柯政和公私領域的活動差異表現，顯示戰前臺人漂泊者立足於跨境的空間流動與文化資本之能動性，和七七事變後北京劇變、複雜的時代語境。致使其於音樂活動和著述裡融會中西視域，且從生活的他方（北京）而非他的來處（臺灣）提供差異性的書寫觀察，建構己身在中國的文化定位與身分認同。北京成為臺人戰時離散體驗的重要空間，承載了柯政和建構中國認同的象徵符號與時局因應的敘事憑藉。

《中國人的生活風景》、《中國的社會風景》顯現柯政和面對時代更迭的文化回應與自我形塑。在寫作背景、預設讀者與官方賦予的文化角色等因素影響下，大東亞文化建設的口號成了柯政和中國敘事的鮮明主調，其敘事纏繞著旅居北京日人的文化適應問題思考，為被誤解的中國社會規範進行同理辯駁和調解，流露出明確的日中比較視域；柯政和詮釋中國社會結構的性情傾向，表現了儀態舉止、關係倫理、等級序列三位一體的新舊匯聚之文化狀態。新的部分指涉的是隨政權更迭與戰爭事變的調動，舊面貌則是自古以來因空間特性、歷史環境、區域差異所混成的文化慣習與社會性格；此外，照片是物質殘餘的光影再現、現實的印記，於展示予人觀看、討論、宣傳之際另具指涉功能。風景二作所附照片不多，卻寄寓作者對中國物景的往日情懷與視域詮釋，人物、物件、語言、藝術和制度都能成為整合的符號。柯政和生活於蛻變為興亞基地的古都，基於敏銳的時代感而描繪持續變遷的中

⁹⁷ 溫迪·J. 達比，〈風景與認同〉，頁4。

⁹⁸ 厄夫·錢伯斯，〈觀光人類學〉，頁48。

國面貌，並營造中日相互理解的空間，由音樂到民族文化進行中國文化知識的論述生產。

柯政和在戰前臺人的討論中顯得獨特又隱晦，起因於活動場域、親日態度、殖民協力官派角色與文革流放等經歷，遮蔽了他的存在，尤其中共建政至文革期間的生平仍待考掘。然就一九二〇至四〇年代的東亞文化場域而言，他的形象演繹與文化視域顯現臺人漂泊主體的特殊樣貌。柯政和的成長經驗、文化活動、著述圖說體現了東亞離散、文化流動，以及旅居北京臺人社群網絡的豐厚意涵。其中國書寫表現離散情境下漂泊者比較視域的文化生產和認同追索：柯政和通過類似民族誌的書寫手段，重新詮釋已不符現代性的部分中國規範，展現他對大東亞視框下愈趨消逝、邊緣化的中國文化眷戀與民族認同，和主體錯置的精神面貌。《中國人的生活風景》與《中國的社會風景》具現一九四〇年代帝國戰爭、「大東亞共榮圈」與中國文化結構的碰撞，也表徵柯氏以「北京」作為展演中國的敘事視框與文化認同。柯政和發自中日文化提攜之政治性凝視，以及新舊中國文化儀式、規範、物件、景點的再現演繹，共同架構某種詮釋結構化的力場——日本帝國權力、中國社會文化與東亞民族統合的思想嵌入。柯政和的戰前活動與著述，是以他所及的資源來回應眼前世界的動向，進行一場穩固自我認同且製造中國的文化生產。於是，柯政和研究意義不單存於臺人漂泊主體的精神樣貌，亦為近代歷史流變中東亞社會演化的見證。

（責任校對：許軒瑜）

附錄：《中國人の生活風景》、《中國の社會風景》目次與
照片圖說

書名	《中國人の生活風景》／照片圖說	《中國の社會風景》／照片圖說
目次	<p>はしがき 中國人の姓名／街頭の賣卜者 中國人の敬稱／玉泉山 中國人の敬禮／上流舊家の客間 中國人の名刺／舊正月風景五一風車賣 中國人の氣質／街頭の外科醫一魚の目の手術 中國の家庭風景／中流家庭の居間 宴會の作法など／涮羊肉—羊肉の水だし 中國人の訪問風景／廟會—緣日風景 中國料理のことなど／烤羊肉—チンギス汗鍋 難しい物の贈答／琉璃塔 小費と言つても／饅頭の呼び賣 支那風呂の極樂氣氛／支那風呂屋 萬年竈ものがたり／油炸餅賣り梨湯賣り 中國の試験風景／雍和宮の佛像 指の表情／紙幣整理の銀號店員 底下人のことなど／茶館風景</p>	<p>はしがき 中國の國號について／前門大街 中國人の衣食住／萬壽山排雲殿の牌樓 中國人の趣味生活／象棋を差す風景 音樂の聴き方／琵琶弾く女 觀劇案内／滿州の禮装した貴婦人 茶を味ふには／水賣りの一輪車 愛郷心と職閑／廣場の情景 中國人の階級思想／高足踊り 中國の刑法／古廟 俗諺と格言／萬壽山の銅亭 民間故事／北京郊外の風景 籠で水を汲む／水汲み 乞食の生活風景／芥溜さらひ 平民娛樂場——天橋／天橋ののぞき 北京の慈善事業／救濟院の寢室 市民の脚／駱駝の石炭運び 義和團餘聞／萬壽山の玉帶橋 中日握手の種々相／故宮博物院 中日兩國人の習慣の差異／昆明湖 阿片及び麻藥問題について／驛車 中國人と結婚することを恐れるな／北海の白塔</p>

引用書目

- 上海圖書館 Shanghai tushuguan, 「中文期刊全文數據庫 (1911-1949)」“Zhongwen qikan quanwen shujuku (1911-1949)”, <https://www.cnbkys.com/search/advance?pid=12&isProduct=false>, 2021 年 1 月 9 日檢索。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Zhongyang yanjiuyuan jindaishi yanjiusuo, 「近代史數位資料庫」“Jindaishi shuwei ziliaoku”, <https://mhdb.mh.sinica.edu.tw/>, 2023 年 7 月 10 日檢索。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Zhongyang yanjiuyuan Taiwanshi yanjiusuo, 「臺灣日記知識庫」“Taiwan riji zhishiku”, <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E9%A6%96%E9%A0%81>, 2023 年 7 月 11 日檢索。
- ,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Taiwan zongdufu zhiyuanlu xitong”, <https://who.ith.sinica.edu.tw/>, 2023 年 7 月 10 日檢索。
- 中國教育圖書進出口有限公司 Zhongguo jiaoyu tushu jinchukou youxian gongsi、得泓資訊有限公司 Dehong zixun youxian gongsi, 「中國近代報刊資料庫：《大公報 1902-1949》」“Zhongguo jindai baokan ziliaoku: *Dagongbao 1902-1949*”, <http://tk.dhcdb.com.tw/tknewsc/tknewskm>, 2022 年 6 月 29 日檢索。
- 漢珍數位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Hanzhen shuwei tushu gufen youxian gongsi, 「漢珍知識網：報紙篇《臺灣日日新報》」“Hanzhen zhishi wang: baozhi pian *Taiwan riri xinbao*”, https://elib.infolinker.com.tw/login_rrxin.htm, 2021 年 1 月 8 日檢索。
- 〈平大教授團赴日視察〉“Pingda jiaoshoutuan fu Ri shicha”, 《申報》(上海) *Shenbao* (Shanghai), 1930 年 7 月 8 日, 第 5 版。
- 〈平津雜寫(六)文化與教育〉“Ping Jin zaxie (liu) wenhua yu jiaoyu”, 《申報》(漢口) *Shenbao* (Hankou), 1938 年 7 月 17 日, 第 2 版。
- 〈音樂家 柯政和著作風行各地〉“Yinyuejia Ke Zhenghe zhuzuo fengxing ge di”, 《申報》(上海) *Shenbao* (Shanghai), 1936 年 3 月 10 日, 第 13 版。
- 〈組織臺灣音樂會〉“Zuzhi Taiwan yinyuehui”, 《臺灣日日新報》(臺北) *Taiwan riri xinbao* (Taipei), 1916 年 2 月 15 日, 第 6 版。
- 〈樂壇消息〉“Yuetan xiaoxi”, 《大公報》(天津) *Dagongbao* (Tianjin), 1934 年 7 月 31 日, 第 13 版。
- 中西利八 Nakanishi Rihachi 編纂, 《中國紳士錄 民國三十一年版》*Zhongguo shenshilu Minguo sanshiyi nian ban*, 東京 Tokyo: 滿蒙資料協會 Man Meng ziliaoxiehui, 1942。

- 厄夫·錢伯斯 Erve Chambers 著，李宗義 Lee Tsung-yi、許雅淑 Hsu Ya-shu 譯，《觀光人類學：旅行對在地文化的深遠影響》*Guanguang renleixue: lüxing dui zaidi wenhua de shenyuan yingxiang*，臺北 Taipei：游擊文化 Youji wenhua，2019。
- 王 歡 Wang Huan、楊賀 Yang He，〈音樂書商——柯政和中華樂社經營理念研究〉“Yinyue shushang: Ke Zhenghe Zhonghua yueshe jingying linian yanjiu”，《學習與探索》*Xuexi yu tansuo*，9，哈爾濱 Harbin：2021，頁 184-191。
- 王升遠 Wang Shengyuan，《文化殖民與都市空間：侵華戰爭時期日本文化人的“北平體驗”》*Wenhua zhimin yu dushi kongjian: qin Hua zhanzheng shiqi Riben wenhuaren de “Beiping tiyan”*，北京 Beijing：三聯書店 Sanlian shudian，2017。
- 王德威 David Der-wei Wang，〈北京夢華錄——北京人到臺灣〉“Beijing menghualu: Beijingren dao Taiwan”，收入陳平原 Chen Pingyuan、王德威 David Der-wei Wang 編，《北京：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Beijing: dushi xiangxiang yu wenhua jiyi*，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2005，頁 360-370。
- 卡特琳·古特 Catherine Grout 著，黃金菊 Huang Jinju 譯，《重返風景：當代藝術的地景再現》*Chongfan fengjing: dangdai yishu de dijing zaixian*，上海 Shanghai：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Huado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2020。
- 卡爾拉 Virinder S. Kalra、柯爾 Raminder Kaur、哈特尼克 John Hutnyk 等著，陳以新 Chen Yi-xin 譯，《離散與混雜》*Lisan yu hunza*，臺北 Taipei：國立編譯館 Guoli bianyiguan、韋伯文化國際出版 Weibo wenhua guoji chuban，2008。
- 朱坤容 Zhu Kunrong，〈和辻哲郎“風土文化論”成因淺析〉“Heshi Zhelang ‘fengtü wenhua lun’ chengyin qianxi”，《浙江樹人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Zhejiang shuren daxue xuebao (renwen shehui kexue ban)*，6.6，杭州 Hangzhou：2006，頁 116-121。
- 何 標 He Biao，《明月多應在故鄉》*Mingyue duo ying zai guxiang*，臺北 Taipei：海峽學術出版社 Haixia xueshu chubanshe，2008。
- 吳韻真 Wu Yunzhen，〈伴隨文也的回憶〉“Bansui Wenye de huiyi”，收入劉靖之 Liu Ching-chih 主編，《民族音樂研究第三輯：江文也研討會論文集》*Minzu yinyue yanjiu di san ji: Jiang Wenye yantaohui lunwenji*，香港 Hong Kong：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Xianggang daxue Yazhou yanjiu zhongxin，1992，頁 7-28。
- 李 岩 Li Yan，〈朔風起時弄樂潮——20 世紀 20 年代的西樂社、愛美樂社及柯政和〉“Shuofeng qi shi nong yuechao: 20 shiji 20 niandai de Xiyueshe, Aimei yueshe ji Ke Zhenghe”，《音樂研究》*Yinyue yanjiu*，3，北京 Beijing：2003，頁 34-43。

- 李文卿 Lee Wen-ching, 《共榮的想像：帝國·殖民地與大東亞文學圈 (1937-1945)》
Gongrong de xiangxiang: diguo, zhimindi yu Dadongya wenxuequan (1937-1945),
新北 New Taipei: 稻鄉出版社 Daoxiang chubanshe, 2010。
- 朋尼維茲 Patrice Bonnewitz 著, 孫智綺 Sun Chih-chi 譯, 《布赫迪厄社會學的第一課》
Buhedi'e shehuixue de di yi ke, 臺北 Taipei: 麥田出版 Maitian chuban、城邦文化 Chengbang wenhua, 2002。
- 林文龍 Lin Wen-long, 《南投縣志卷七：人物志》*Nantou xianzhi juan qi: renwuzhi*,
南投 Nantou: 南投縣文化局 Nantouxian wenhuaju, 2010。
- 林呈蓉 Lin Cheng-rong、荒木一視 Araki Hitoshi, 〈臺灣之於「東洋協會」的歷史意義〉
“Taiwan zhiyu ‘Dongyang xiehui’ de lishi yiyi”, 《Journal of East Asian Identities》, 1, 山口 Yamaguchi: 2016, 頁 53-80。
- 林獻堂 Lin Xiantang 著, 許雪姬 Hsu Hsueh-chi 編, 《灌園先生日記 (九) 一九三七年》
Guanyuan xiansheng riji (jiu) 1937 nian, 臺北 Taipei: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 Zhongyang yanjiuyuan Taiwanshi yanjiusuo, jindaishi yanjiusuo, 2004。
- 施淑 Shi Shu, 〈大東亞文學共榮圈《華文大阪每日》與日本在華占領區的文學統制〉
“Dadongya wenxue gongrongquan Huawen Daban meiri yu Riben zai Hua zhanlingqu de wenxue tongzhi”, 《新地文學》*Xindi wenxue*, 1.1, 臺北 Taipei: 2007, 頁 41-72。doi: 10.29549/YYWYLL.200709.0003
- 柯政和 Ke Zhenghe, 〈民國十六年的我國音樂界〉“Minguo shiliu nian de woguo yinyuejie”,
《新樂潮》*Xinyuechao*, 1.5, 北京 Beijing: 1927, 頁 1-3。
- _____, 〈教育音樂的目標〉“Jiaoyu yinyue de mubiao”, 《教育學報》*Jiaoyu xuebao*, 1, 北京 Beijing: 1939, 頁 22-29。
- _____, 〈中國音樂的復興〉“Zhongguo yinyue de fuxing”, 《華文大阪每日》
Huawen Daban meiri, 4.2, 大阪 Osaka: 1940, 頁 14-15。
- _____, 〈音樂與文化〉“Yinyue yu wenhua”, 《華文大阪每日》
Huawen Daban meiri, 6.9, 大阪 Osaka: 1941, 頁 2。
- 約翰·伯格 John Berger 著, 吳莉君 Wu Li-jun 譯, 《觀看的方式》*Guankan de fangshi*,
臺北 Taipei: 麥田出版 Maitian chuban, 2010。
- 胡旂旒 Hu Yini, 〈對《標準樂理教科書》的介紹與評價〉“Dui Biaozhun yueli jiaokeshu de jieshao yu pingjia”,
《中國音樂教育》*Zhongguo yinyue jiaoyu*, 10, 北京 Beijing: 2016, 頁 27-31。
- 夏祖麗 Julie Chang、應鳳凰 Ying Feng-huang、張至璋 Zhang Zhi-zhang 等, 《蒼茫暮色裡的趕路人：何凡傳》
Cangmang muse li de ganluren: He Fan zhuan, 臺北 Taipei: 天下文化 Tianxia wenhua, 2003。

- 徐 賁 Xu Ben, 〈布迪厄論知識場域和知識份子〉“Budi’e lun zhishi changyu he zhishi fenzi”,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Ershiyi shiji shuangyuekan*, 70, 香港 Hong Kong: 2002, 頁 75-81。
- 徐友春 Xu Youchun 主編, 《民國人物大辭典》*Minguo renwu da cidian*, 石家莊 Shijiazhuang: 河北人民出版社 Hebei renmin chubanshe, 2007。
- 秦賢次 Qin Xian-ci, 〈五四時期臺灣學生負笈行——柯政和、宋斐如、王慶勳、洪炎秋〉“Wusi shiqi Taiwan xuesheng fuji xing: Ke Zhenghe, Song Feiru, Wang Qingxun, Hong Yanqiu”, 《文訊》*Wenxun*, 283, 臺北 Taipei: 2009, 頁 75-84。
- 高天棲 Gao Tianqi, 〈保衛東亞與保衛東亞之歌 譜成旋律的兩位作曲家〉“Baowei Dongya yu baowei Dongya zhi ge pucheng xuanlü de liang wei zuoqujia”, 《華文大阪每日》*Huawen Daban meiri*, 6.7, 大阪 Osaka: 1941, 頁 8-9。
- 問楚寒 Wen Chuhan, 《《新樂潮》之“新”——20 世紀 20 年代柯政和辦刊思想研究》*Xinyuechao zhi “xin”: 20 shiji 20 niandai Ke Zhenghe bankan sixiang yanjiu*, 北京 Beijing: 中國藝術研究院碩士論文 Zhongguo yishu yanjiuyuan shuoshi lunwen, 2017。
- 國 軒 Guoxuan, 〈一年來的漢奸活動 傀儡組織的內幕及其現狀〉“Yi nian lai de Hanjian huodong kuilei zuzhi de neimu ji qi xianzhuang”, 《大公報》(香港) *Dagongbao (Hong Kong)*, 1939 年 1 月 23 日, 第 8 版。
- 康尹貞 Kang Yin-chen, 〈日治時期臺灣戲曲之研究 (1895-1937)〉“Rizhi shiqi Taiwan xiqu zhi yanjiu (1895-1937)”, 《戲劇學刊》*Xiju xuekan*, 21, 臺北 Taipei: 2015, 頁 47-72。
- 張 泉 Zhang Quan, 〈張深切移居北京的背景及其“文化救國”實踐〉“Zhang Shenqie yiju Beijing de beijing ji qi ‘wenhua jiuguo’ shijian”, 《臺灣研究集刊》*Taiwan yanjiu jikan*, 92, 廈門 Xiamen: 2006, 頁 80-88。
- 張文薰 Chang Wen-hsun, 〈帝國邊界的民俗書寫：戰爭期在台日人的主體性危機〉“Diguo bianjie de minsu shuxie: zhanzhengqi zai Tai Riren de zhutixing weiji”, 《臺灣文學研究彙刊》*Taiwan wenxue yanjiu jikan*, 20, 臺北 Taipei: 2017, 頁 107-132。doi: 10.3966/181856492017020020004
- 張玉書 Zhang Yu-shu, 〈旅京柯政和樂師招飲〉“Lü Jing Ke Zhenghe yueshi zhaoyin”, 《詩報》*Shibao*, 25, 桃園 Taoyuan: 1931, 頁 1; 後收入龍文出版社編輯部 Longwen chubanshe bianjibu 編, 《詩報——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學大成 (1930-1944)》*Shibao: Rizhi shiqi Taiwan chuantong wenxue dacheng (1930-1944)* 第 2 冊, 臺北 Taipei: 龍文出版社 Longwen chubanshe, 2007, 無頁碼。

- 梁茂春 Liang Maochun, 《音樂史話》*Yinyue shihua*, 北京 Beijing: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2011。
- 莽克榮 Mang Kerong, 《老志誠傳》*Lao Zhicheng zhuan*, 北京 Beijing: 中國文聯出版社 Zhongguo wenlian chubanshe, 2004。
- 許地山 Xu Dishan, 〈窺園先生詩傳〉“Kuiyuan xiansheng shi zhuan”, 收入許南英 Xu Nanying 著, 《窺園留草》*Kuiyuan liucaos*, 臺北 Taipei: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Taiwan yinhang jingji yanjiushi, 1962, 頁 233-248。
- 許雪姬 Hsu Hsueh-chi, 〈1937 年至 1945 年在北京的台灣人〉“1937 nian zhi 1945 nian zai Beijing de Taiwanren”, 《長庚人文社會學報》*Changgeng renwen shehui xuebao*, 1.1, 桃園 Taoyuan: 2008, 頁 33-84。doi: 10.30114/CGJHSS.200804.0003
- 郭洪紀 Guo Hongji, 《文化民族主義》*Wenhua minzu zhuyi*, 臺北 Taipei: 揚智文化 Yangzhi wenhua, 1997。
- 郭豔波 Guo Yanbo, 〈對北京愛美樂社——音樂雜誌《新樂潮》的研究〉“Dui Beijing Aimei yueshe: yinyue zazhi *Xinyuechao* de yanjiu”, 《北方音樂》*Beifang yinyue*, 7, 哈爾濱 Harbin: 2010, 頁 31。
- 陳陽 Chen Yang, 〈「地勢寫真畫」: 民初風景照中的民族認同〉“‘Dishi xiezhen hua’: Minchu fengjingzhao zhong de minzu rentong”,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Ershiyi shiji shuangyuekan*, 165, 香港 Hong Kong: 2018, 頁 65-81。
- 彭芳 Peng Fang, 〈柯政和對我國音樂事業的貢獻〉“Ke Zhenghe dui woguo yinyue shiye de gongxian”, 《當代音樂》*Dangdai yinyue*, 34, 長春 Changchun: 2015, 頁 124-125。
- 菊仙 Juxian, 〈新中國一瞥的印象 (十三)〉“Xin Zhongguo yi pie de yinxiang (shisan)”, 《臺灣新民報》(臺北) *Taiwan xin minbao* (Taipei), 1930 年 9 月 27 日, 第 7 版。
- _____, 〈新中國一瞥的印象 (十五)〉“Xin Zhongguo yi pie de yinxiang (shiwu)”, 《臺灣新民報》(臺北) *Taiwan xin minbao* (Taipei), 1930 年 10 月 11 日, 第 7 版。
- 賀逸文 He Yiwen 等撰, 張雷 Zhang Lei 編, 《北平學人訪問記 (上)》*Beiping xueren fangwenji (shang)*, 北京 Beijing: 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 2020。
- 黃旺成 Huang Wang-cheng 著, 許雪姬 Hsu Hsueh-chi 編註, 《黃旺成先生日記 (17) 一九三〇年》*Huang Wangcheng xiansheng riji (17) 1930 nian*, 臺北 Taipei: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Zhongyang yanjiuyuan Taiwanshi yanjiusuo, 2017。

- 黃英哲 Huang Ying-che, 〈漂泊〉“Piaobo”, 收入史書美 Shih Shu-mei、梅家玲 Mei Chia-ling、廖朝陽 Liao Chao-yang、陳東升 Chen Dong-sheng 編, 《台灣理論關鍵詞》*Taiwan lilun guanjianci*, 新北 New Taipei: 聯經出版 Lianjing chuban, 2019, 頁 295-305。
- 楊水心 Yang Shui-xin 著, 許雪姬 Hsu Hsueh-chi 編註, 《楊水心女士日記(三)一九三四年、一九四二年》*Yang Shuixin nüshi riji (san) 1934 nian, 1942 nian*, 臺北 Taipei: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Zhongyang yanjiuyuan Taiwanshi yanjiusuo, 2015。
- 楊東平 Yang Dongping, 《城市季風: 北京和上海的變遷與對峙》*Chengshi jifeng: Beijing he Shanghai de bianqian yu duizhi*, 臺北 Taipei: 捷幼出版社 Jieyou chubanshe, 2006。
- 溫迪·J. 達比 Wendy Joy Darby 著, 張箭飛 Zhang Jianfei、趙紅英 Zhao Hongying 譯, 《風景與認同: 英國民族與階級地理》*Fengjing yu rentong: Yingguo minzu yu jieji dili*, 南京 Nanjing: 譯林出版社 Yilin chubanshe, 2018。
- 葉芸芸 Ye Yun-yun, 《餘生猶懷一寸心》*Yusheng you huai yi cun xin*, 新北 New Taipei: INK 印刻出版 INK Yinke chuban, 2006。
- 編者 Bianzhe, 〈華北教育家座談會: 十八、中日文化交流之首要辦法當在溝通語言先生對此有何高見賜教?〉“Huabei jiaoyujia zuotanhui: shiba, Zhong Ri wenhua jiaoliu zhi shouyao banfa dang zai goutong yuyan xiansheng dui ci you he gaojian sijiao?”, 《國民雜誌》*Guomin zazhi*, 2.7, 北京 Beijing: 1942, 頁 53。
- , 〈華北教育家座談會: 十八、中日文化交流之首要辦法當在溝通語言先生對此有何高見賜教?〉“Huabei jiaoyujia zuotanhui: shiba, Zhong Ri wenhua jiaoliu zhi shouyao banfa dang zai goutong yuyan xiansheng dui ci you he gaojian sijiao?”, 《婦女雜誌》*Funü zazhi*, 3.7, 北京 Beijing: 1942, 頁 35。
- 鄭祖邦 Cheng Tsu-bang, 〈對布迪厄社會學知識進展的考察〉“Dui Budi’e shehuixue zhishi jinzhan de kaocha”, 《社會理論學報》*Shehui lilun xuebao*, 6.1, 新加坡 Singapore: 2003, 頁 101-135。
- 賴俊雄 Lai Chung-hsiung, 〈當代離散: 差異政治與共群倫理〉“Dangdai lisan: chayi zhengzhi yu gongqun lunli”, 《中外文學》*Zhongwai wenxue*, 43.2, 臺北 Taipei: 2014, 頁 11-56。doi: 10.6637/CWLQ.2014.43(2).11-56
- 薛宗明 Hsueh Tsung-ming, 《臺灣音樂辭典》*Taiwan yinyue cidian*, 臺北 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 2003。
- 韓國鑽 Han Guo-huang, 《韓國鑽音樂文集(一)》*Han Guohuang yinyue wenji (yi)*, 臺北 Taipei: 樂韻出版社 Yueyun chubanshe, 1990。

- 譚家博 Andrew Ka Pok Tam, 〈中國風土和人間的多元性：論和辻哲郎的《風土》的中國文化觀〉“Zhongguo fengtu he renjian de duoyuanxing: lun Heshi Zhelang de Fengtu de Zhongguo wenhuaguan”, 《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Taiwan Dongya wenming yanjiu xuekan*, 19.1, 臺北 Taipei: 2022, 頁 1-39。doi: 10.6163/TJEAS.202206_19(1).0001
- 日外アソシエーツ株式会社 Nichigai asoshieitsu kabushiki gaisha, 「WhoPlus」, <https://web.nichigai.jp/nos/nweb/login/>, 2023年7月20日檢索。
- 讀賣新聞 Yomiuri shinbun, 「ヨミダス歴史館」“Yomidasu rekishikan”, <https://database.yomiuri.co.jp/rekishikan/>, 2022年12月10日檢索。
- 〈東洋協會と教育 音樂學校修業の本島生〉“Tōyō kyōkai to kyōiku ongaku gakkō shūgyō no hontōsei”, 《臺灣日日新報》(臺北) *Taiwan nichinichi shinpō* (Taipei), 1919年5月17日, 第1版。
- 〈臺中大音樂 東京專門家招聘〉“Taichū daiongaku Tōkyō senmonka shōhei”, 《臺灣日日新報》(臺北) *Taiwan nichinichi shinpō* (Taipei), 1919年8月7日, 第7版。
- 〈臺灣音樂會組織〉“Taiwan ongakukai soshiki”, 《臺灣日日新報》(臺北) *Taiwan nichinichi shinpō* (Taipei), 1916年2月14日, 第5版。
- 安野一之 Yasuno Kazuyuki, 〈華北占領地域における文化工作の諸相〉“Kahoku senryō chiiki ni okeru bunka kōsaku no shosō”, 收入杉野要吉 Sugino Yōkichi 編, 《交争する中国文学と日本文学：淪陷下北京 1937-45》*Kōsōsuru Chūgoku bungaku to Nihon bungaku: rinkan ka Pekin 1937-45*, 東京 Tokyo: 三元社 Sangensha, 2000, 頁 322-336。
- 安藤更生 Andō Kōsei 編, 《北京案内記》*Pekin annaiki*, 北京 Beijing: 新民印書館 Shinmin inshokan, 1941。
- 竹中憲一 Takenaka Kenichi 編著, 《人名事典「満州」に渡った一万人》*Jinmei jiten “Manshū” ni watatta ichiman nin*, 東京 Tokyo: 皓星社 Kōseisha, 2012。
- 尾高暁子 Odaka Akiko, 〈兩大戦間期の中日ハーモニカ界にみる大衆音楽の位置づけ〉“Ryō Taisen kanki no Chū Nichi hāmonikakai ni miru taishū ongaku no ichi zuke”, 《東京藝術大学音楽学部紀要》*Tōkyō geijutsu daigaku ongaku gakubu kiyō*, 33, 東京 Tokyo: 2007, 頁 15-34。
- 杉山平助 Sugiyama Heisuke, 《支那と支那人と日本》*Shina to Shinajin to Nihon*, 東京 Tokyo: 改造社 Kaizōsha, 1938。
- 柯丁丑 Ke Dingchou, 〈臺灣の劇に就いて〉“Taiwan no geki ni tsuite”, 《臺灣教育會雜誌》*Taiwan kyōiku zasshi*, 133, 臺北 Taipei: 1913, 頁 57-62。

- 柯政和 Ke Zhenghe, 《中國人の生活風景》*Chūgokujin no seikatsu fūkei*, 東京 Tokyo: 皇國青年教育協會 Kōkoku seinen kyōiku kyōkai, 1942。
- _____, 《中國の社會風景》*Chūgoku no shakai fūkei*, 東京 Tokyo: 大阪屋號書店 Osaka yagō shoten, 1943。
- 陳逢源 Chen Fengyuan, 《新支那素描》*Shin Shina sobyō*, 臺北 Taipei: 臺灣新民報社 Taiwan shin minpō sha, 1939。
- 湯原健一 Yuhara Kenichi, 〈大阪屋号書店小史〉“Osakayagō shoten shōshi”, 《愛知大学国際問題研究所紀要》*Aichi daigaku kokusai mondai kenkyūjo kiyō*, 153, 名古屋 Nagoya: 2019, 頁 87-124。
- 編 者 Hensha, 〈文献紹介〉“Bunken shōkai”, 《民俗臺灣》*Minzoku Taiwan*, 3.11, 臺北 Taipei: 1943, 頁 44。

Vignettes of China in the Eyes of a Drifting Individual: Taiwanese Musician Ke Zhenghe's Social Observation and Writing in Beijing during 1922-1945

Lo Shih-yun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sylo@nccu.edu.tw

ABSTRACT

Ke Zhenghe 柯政和 (1889-1979) was a Taiwan-born musician and educator who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development of music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He spent his entire life in Taiwan, Japan, and China, and was particularly active in the cultural circles in war-time Beijing; from mid-1910s to World War II, his articles frequently appeared in newspapers in Taiwan and China. However, his role as a pioneer of modern music education is rarely discussed in Taiwan. The reasons for this are threefold: information about him has been scarce; he was primarily active in China and did not return to Taiwan after 1945; and his wartime activity, which involved a teaching position in Japan-occupied Beijing, was sensitive. Nevertheless, Ke is a significant figure for the research of Taiwanese migrations in East Asia under Japanese rule, of the Taiwanese diaspora in general, and of cultural networks in wartime Beijing. For these reason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evolution of Ke's image in China and Taiwan by looking at his cultural activities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from 1922 to 1945, as well as by examining his narratives about China in his two wartime publications, *Vignettes in the Life of the Chinese* and *Vignettes in Chinese Society*. Through these materials, this study aims to present images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of Taiwanese under Japanese rule, thereby showcasing the spiritually-drifting landscape of prewar Taiwanese people in Beijing.

Key words: Ke Zhenghe 柯政和, wartime Beijing, drifting, vignettes

(收稿日期：2023. 5. 29；修正稿日期：2023. 10. 6；通過刊登日期：2023. 9. 25)

